

論國共合作

馬健著

一九四二

北社

馬健著

論國合作

北社印行

1941.4.



Copyright for 1941

論馬寧一
國健價四九
共健價四九
合一年一
著作元月行
印

目次

一	轉變期的中國	一
二	第一次國共合作	八
三	從北伐到大革命的逆流	一三
四	一個答覆：展開蘇維埃的旗幟	一九
五	自相殘殺的「圍剿」時期	二二
六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根據	二八
七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三四
八	中國歷史斷續的轉捩點——「西安事變」	四〇
九	「三中全會」——「安內」國策的結束	四六
一〇	第二次國共合作	五二
一一	抗戰第一階段	五七
一二	抗戰第二階段	七〇
一三	「抗戰的第四周年將是最困難的一年」	八一
一四	一個光明的前途——建立新中國	一〇五
後記		一一四

365222

轉變期的中國

好一個矜誇自大的中華民族——他們以廣大的領土自誇，說是在全世界僅次於荷聯；他們以人口的衆多自誇，說是佔了全世界人類的五分之一；他們以古老的文化自誇，說是有五千年光榮燦爛的歷史；他們以有愛好和平，耐勞耐勞的精神自誇，說是在全世界是一種最和平，最有能力的民族！

可是我國因爲太自滿自足，所以二三十年來長期的在那東方的封建主義階段上「龜步」的爬行着，不再前進。因此，特別從十九世紀以來，由於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及其勢力的東向，於是我國各方面的落後性，尤其是在經濟方面，完全暴露出來；這塊厚，肥，美，香的天鵝肉，西方的爛蝦蟆怎好不垂涎，肯讓它滑口而去呢？由於這種種的落后，暴風雨般的打擊遂四面八方地襲來，真的，除了懶漢，誰都要欺凌中國了。

首先，「殖民地的王國」英吉利在鴉片戰爭中（一八四〇——四二年）向我國開了第一刀，就摧毀了那閉關自守的萬里長城，鴉片漸漸取得對中國人的統治權，皇帝及其拘泥的官僚們，也就漸漸失去自己的統治權（馬克思）跟着發生英法聯軍進攻中國之役（一八五六一一六〇年）……最後「蕞爾小國」的日本（一八九四——九五年）也敢來欺負我國了，在馬關條約簽訂以後，歐美各國（連同日本）已從工業資本主義進到帝國主義時期——即自由貿易（輸出商品）進到壟斷資本（輸出資本）時期，所以爲着爭取對華投資的保障，就避免相互間的衝突，成立諒解，注意各自勢力範圍的劃

分，這樣侵略中國的方式就從軍事的轉向政治的，經濟的了，中國的銀行，鐵道，海關，航運，礦山……就完全落在帝國主義統制之下，於是中國由獨立國家地位開始踏上半殖民地悲慘途徑。

但是，帝國主義雖然以大工業來打擊我國的手工業，並不引為滿足，因為只限于都市，不能深入農村；因此，它們爲了加重對利潤的剝削，就通過軍閥，官僚，地主，商人，高利貸者，和資本家，來剝削中國廣大的農民羣衆，這些人做了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商品推銷的掮客，所謂買辦階級就這樣產生了，從此，通過買辦階級，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開始結了不解緣，但另一方面，中國的農民在這一殘酷的層層剝削下面，自然只有大批的破產，失業與貧窮化，發生了大量的農村人口過剩。

從那時起，一方面我國二千年來的封建制度就變做日暮途窮，『正如小心保存在緊密封閉的棺材內的木乃伊一樣，只要與外界新鮮空氣一接觸，便一定腐敗』（馬克思）了！不過，另一方面，帝國主義也已經明白：要加緊殖民地的剝削，封建主義是推翻不得的，只有支持中國封建的殘餘勢力，才能阻礙與絞殺中國革命勢力的進展，這樣對封建的社會關係加以有力支持是必然的邏輯了！於是中國人民從此更加上半封建經濟的壓迫。

難道我們如此馴服，任人宰割嗎？不，首先遭遇着直接威脅的農民，『在桌子開始跳舞以前不久，在中國，在這塊活的頑石上，開始了革命醞釀』（恩格斯）了。太平天國時期（一八五〇——六四年）反封建運動普及了全國，不過農民自身力量是不够的，組織太散漫，沒有中心領導，同時他們並不怎樣堅決，因爲他們的目的只在取得土地，以後就不管，結果革命失敗了。

農民運動失敗後，隨之而起的是士大夫層的戊戌維新運動；他們只拉攏上層，遠離羣衆，所以在頑固統治層，西太后的打擊下，就趨於完全失敗。

另一方面，在羣衆中間則發生廣大的運動——就是義和團運動；它在意義上不只反清（直接的），而同時是反帝國主義的（間接的），這是對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直接反響。可憐組織散漫，這太平天國以後的農民運動就在「文明」國的「文明行爲」——八國聯軍入京——下葬送了。不管運動后期怎樣爲滿清所利用——口號從「反清復明」轉到「扶清滅洋」——但它總不失爲一個原始的反帝運動，也就是我國民衆有革命覺悟的初步。

急進的布爾喬亞在受了維新運動與義和團運動之後就進行民主革命，以孫中山、黃興領導的同盟會爲大本營。雖然通過辛亥革命，清朝被推翻，民國建立了；但由於內部領導不強，主張不明確（口號是單純的反清，沒有標明反帝與反妥協的政策，反而「要求世界列國對於中國革命事業的贊助」），沒去組織與領導羣衆運動，更因成分複雜，鬧着什麼「革命成功，革命黨消」，這樣不澈底的合作怎能持久呢？同時他們只靠單純的軍事行動，這又怎能敵得過那有雄厚兵力的世袁凱呢？

因此，辛亥革命又失敗了，革命的結果給袁氏造成地位，從此以後，就有封建勢力的軍閥的跋扈時代；帝國主義勾結他們，實行收買，分化，挑撥……而使中國發生長期的內戰，什麼二次三次的「革命戰爭」，直皖戰爭，直奉戰爭，江浙戰爭等；這不但使中國統一渺渺無期，而且中國農民更加破產，整個勞苦羣衆的生活，更加惡化了。

但帝國主義的如意算盤并不打得那樣好，一九一四年瘋狂殘酷的世界爭霸戰爆發了，各帝國主義都被牽入漩渦，而對我國的侵略却放鬆了許多；只有日本對我國的侵略更加加緊，特別是二十一條與佔領膠濟鐵路，但仍不能阻止我國資本主義部分的發展。

從那時起，覺悟的買辦階級就變成了民族資本家（這並不是說中國以前沒有資本家），從事復興民族工業，以抗衡外來資本的侵略；同時，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也有意識的，無意識的使中國工人階級漸漸地從「自在的」轉變為「自為的」階級。

但好景不常，不久世界大戰結束；在凡爾賽會議上因對山東問題，得不到解決，激起了在民族資產階級領導下吸引了廣大小資產階級的學生，商人，貧民以及部分的工人參加的「五四」運動，這雖然是辛亥革命後更進一步的反帝運動，但在政治上——打倒軍閥，反對帝國主義，是失敗了，因為第一，這一運動沒有一個堅強的政黨來領導，國民黨在辛亥革命後已經瓦解了，同時無產階級的政黨還沒形成；第二，由於民族資產階級的領導作用，反帝的方式限制在比較和平的改良主義方面，只是反日而不反帝，而且他們一部分還主張聯美反日就是在反日鬥爭中也只限制在抵制日貨的口號下，在反帝鬥爭方式上却只限於罷課，罷市，罷工，沒有去組織羣衆的力量。用民族革命戰爭來驅逐日本和各帝國主義，第三，沒有吸收廣大的工農來參加，只以學生作主力，你想，僅僅憑他們五分鐘熱度的鬥爭，怎能驅逐帝國主義出中國呢？但是，「五四」運動對中國民主革命是有貢獻的，很巧合地像紅線般劃分新舊兩個前途。我們知道自從一九一四年爆發了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與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在地球六分之一

的土地上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以來，整個世界的歷史就改變了它的方向，劃分了它的時代；以前的資產階級革命的舊紀元，以後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新紀元。所以噸噸落日的那些尚存的資本主義部分非更加依賴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過活了，而欣欣向榮的社會主義的蘇聯爲了全人類的徹底解放，必然竭力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運動。這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國家一旦發生了民族革命，不管參加的階級，黨派或個人意識到與否，只要他們反帝，他們的革命就成了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且更構成爲社會主義革命的同盟軍；在它，第一步，民主革命，第二步，社會主義革命。

所以，這新的世界革命以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爲主力軍，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壓迫民族爲同盟軍，同時重要的却由於蘇聯的領導，支持與幫助，才能使西方的無產階級與東方被壓迫民族接近在一起。這，在一九一九年第三國際建立後就展開這一運動的領導。

同時，在國內，我們知道，自一九一四一四年歐戰爆發後，這予中國民族資本一個極好的發展機會。中國的工業，尤其是輕工業，就在這時有突飛猛進的發展，因此，中國的無產階級的力量也堅強了。他們人類雖然不多，但比脆弱的資產階級却強得多了，這時，他們不僅受了帝國主義與封建力量的壓迫，更加上民族資本的剝削——由於這三重壓迫的匯合，他們就開始覺悟起來，爲了它本身的解放，就只要堅決，忠實於他們的事業。

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給予中國工人階級以興奮，工人政權是建立了；這是鼓勵中國工人也一樣的可以建立他們的祖國。

再「五四」運動的爆發，吸引了廣大羣衆參加這一反帝運動，而中國工人就在那時候第一次踏上了政治舞台，參加這鬥爭；在他們，是從經濟鬥爭轉到政治鬥爭了，在這鬥爭過程中，布爾喬亞的妥協性、動搖性，不徹底性全部暴露出來，真的，表明了，特別廣大資產階級，不但不願意與帝國主義完全分裂，並且還和農村中的土地主剝削有密切聯系，這，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假如由它負擔不是大成問題嗎？所以爲了工人階級的前途——共產主義社會的實現，第一就要完成當前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所以他們積極參加任何反帝反封建的鬥爭，並且成爲這些鬥爭的積極支持者與堅決領導者，使這鬥爭進行得最徹底，以便很快的轉變到社會革命。有了這偉大的潛勢力，且在「五四」後新思想東來，更加武裝了他們的頭腦，這就促成一九二一年無產階級的領導中心，中國共產黨的誕生，自中共呱呱墜地后在它的推動與爭取下，使資產階級又精神奕奕了起來，因此中國革命的動力就起了很大的變化。

由於這些國際國內條件的匯合，中國走向資本主義的前途不但脆弱，而且是不可能了。一點也不錯，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偉大的一部分，這樣：「決定中國革命的主要事實：（一）中國半殖民地的地位及帝國主義在財政上經濟上的統治；（二）封建殘餘的壓迫，因軍閥制度及官僚制度而加深；（三）無數百萬工農羣衆反封建官僚的壓迫，反軍閥制度，反帝國主義的鬥爭日益增長；（四）民族資產階級及政治上的薄弱，它對於帝國主義的依賴，它畏懼革命運動的發展；（五）無產階級的革命積極性，及其在廣大勞苦羣衆中間的威信日益增漲；（六）中國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相鄰近；（斯大林論中國革命問題第一頁）由此，「這個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階段（其中又分爲許多小階段）決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國

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社會，而是要建立中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以完結其第一階段。然後，再使之發展到第二階級，以建立中國社會主義的社會（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

中國現時的革命，是在做第一步，掃除民族的被壓迫，政治的黑暗與經濟的落後，這樣來改變這個殖民地（自一九一八以來，在日本佔領的地區是殖民地地地統治着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使之變成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見前書第六頁）。

這樣說來，在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壓迫下，不管工、農、小資產階級或民族資產階級的前面安置着兩個極端相反的前途，亡國奴或自由民，滅亡或解放。但他們都一致的選擇自由民與解放的途徑。

資產階級，在半殖民地的中國，與歐美資本主義國家截然不同，它的死敵在此時此地，不是無產階級，而是外部帝國主義，與內部封建殘餘的匯合力量，所以，就是把它在脆弱性撇開不管，爲了它自身的利益，它也要與無產階級合作並利用後者的力量以企圖建立那「決不是」「也不能」的「布爾喬亞」社會，這同樣，資產階級的政黨與無產階級的政黨底合作是邏輯的必然了。

所以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階級，就是國共合作，它倆的悲歡離合對中國人民有切身關係的，分裂，就使革命失敗，合作，就使革命勝利，這一歷史的教訓，對從事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運動的人們是有極大好處的，但在中國抗戰三十六個月后的今天對中國人民大眾則有更重大的意義，因爲「行百里者半九十」，更加腳踏實地向前，便是勝利的坦途，那麼，珍貴這一合作，就是加速達到勝利。

往下，是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運動已經走過，正在走着，及將要走向的道路。

一 第一次國共合作

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給予全世界弱小民族一個異常強烈的刺激；革命的火花就由歐洲吹遍到亞洲大陸，真是「兩極相逢」般的，到處燃燒着，滋長着。印度的反英運動，朝鮮的反日運動……雖然都暫時遭受了挫折，可是「近東病夫」土耳其却在蘇俄平等的援助下，一九二二年擊退英、希聯軍，建立了新土耳其。

那「遠東病夫」中國又怎樣呢？

「五四」後，帝國主義元氣復蘇了，就不讓我國再保持在一九一四——一八年僅有的民族資本主義的部份發展，一面加緊經濟侵略，一面挑撥軍閥內戰，來摧毀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前途。此路雖然不通，但「柳暗花明又一村」，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蘇俄政府對中國人民發表了有歷史意義的宣言，宣佈取消沙俄時期奴役中國的一切密約，並放棄那時期在華所攫奪的一切利益和特權，同時，更主張根據絕對的平等原則，與中國建立友誼的邦交。這，深深的感動了中國人民大眾。

在中國北方，一般革命羣衆根據這一宣言，深切的感覺到俄國革命成功在那兒，中國革命失敗在那兒，雖然那時北方政府竭力拒絕與蘇俄進行談判，但他們却不顧一切地的與蘇俄建立起友誼關係來。同時，在中國南方，孫中山正在建立（一九二一年）革命政府，準備北伐，掃除那和帝國主義勾結的

1941
1921
20 P. C.

封建軍閥政權；可是當時的國民黨固然是反映當時社會思想的複什，同時也就是反映黨內成分的複什，（當然這樣的黨，在民族革命的階段上，是可以使它成爲一種特殊的組織——民族革命各階級聯盟。後來的事實（大革命時期）完全證明了這一可能，）這樣，怎能負起這一重荷？因此，就引起他外求與國內求盟友的決心。

另外，共產黨間接領導下的一九二二年春香港三萬餘海員，工人罷工雖然勝利了，可是隔年二月它直接領導下的漢京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却在吳佩孚的武力壓迫下釀成「二七」大屠殺。工人運動雖然一時的失敗了，但他們已由日常的經濟鬥爭，迅速地轉變到了解與運用政治鬥爭，不過他們雖然是頂堅決的，對反帝反軍閥起着主導的作用，但由於中國社會性質所規定，假如沒有其它各革命階級的積極擁護與配合行動，去打擊共同的敵人，是力不從心的。

國共兩黨既具有同一的要求，就打定了它們合作的基礎，架搭這座橋樑的，却是有正確歷史眼光的世界友人——蘇俄。

一九二二年蘇俄代表越飛來中國，本來是派他來和北方政府修睦邦交的；但北方政府是帝國主義的翼下之卵，同時各帝國主義還在計劃着粉碎社會主義政權那一個怪物——蘇維埃，所以北方政府就拒絕了蘇俄的好意。這，越飛只得南來與成立不久的廣東革命政府接洽了。

那年，越飛和孫中山在滬經過幾次誠懇地交換意見的結果，就成立有名的「越飛孫文協定」，這協定大意是尊重中國主權（包括外蒙古）和援助中國革命。

但更有決定意義的是一九二二年五月中共的二全大會的宣言上指出：『在現今的奮鬥進行中間，只有無產階級的革命勢力和民主主義的革命勢力合同動作，才能使真正民主革命迅速成功。』這就決定組織反帝的民族統一戰線，幫助改組國民黨使形成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民族革命聯盟。並訂出門爭綱領：『一、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二、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的完全獨立；三、統一中國本部東三省（在內）爲真正民主共和國；四、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實行自治，成爲民主自治邦；五、用自由聯邦制，統一中國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六、工人和農民無論男女在各級議會市議會有無限制的選舉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罷工絕對自由；七、製定關於工人和農民以及婦女的法律。』（引自中國問題第九六頁）這，大體都反映在改組後國民黨二全大會的宣言上，成爲大革命時期人民大眾奮鬥的目標。

孫中山返粵後，在他的提議下，就開始國民黨改組運動；更重要的是歡迎共產黨到廣東來。

不久，就決定兩大政策：聯俄與聯共。中國共產黨員多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襄助改組事宜。十一月更在廣州成立了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由委員九人主持，並聘請羅鮑廷爲廣東國民政府最高政治顧問。可是「合作」問題在兩黨的陣營裏却生出枝節：在國民黨方面——鄒魯、戴天仇、林森、張繼（去年九月二十二日張繼在延安一個座談會上直率承認：『民國十三年，我是反對容共最堅決的一個，現在想起來，非常錯誤。』）輩的所謂西山會議派馬上聯名發出護黨宣言：『自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其所宣傳打倒英美日法等帝國主義者其作用係在破壞國民黨在國際之好感。一方面則注意打破國民黨與國

民黨各實力派之合作，其計劃係在消滅國民黨……，「……共黨分子事事效忠於蘇聯，拋棄三民主義，……企圖使本黨成爲蘇聯之附屬團體……」（見護黨特刊）這不是曲解孫中山的「共產主義是三民主義的好朋友」就是別有用意了。

在共產黨方面——陳獨秀的「一切工作歸國民黨，共產黨不要有獨立的工作」，「中國共產黨早生了五年」這將「合作」與「混合」糝糊了，是取消主義的思想了，而且違反共產國際「不要與資產階級混合，而要保持無產階級運動之獨立性，雖是這種無產階級運動或尙無萌芽的形式」的決議，這成爲機會主義的根源；而張國燾的「工人應該在自己的政黨旗幟之下，參加民族革命，若加入資產階級性的國民黨，便不免有混亂無產階級思想的危險」這是不理解列寧的指示「共產主義者可以並且必須與反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暫時（注意：是指在民主革命階段內，因爲歷史上上的時間，幾十年還是很暫時）的聯合」，關門主義的種子此後將會開花了。很明顯的這兩種思想都是想把資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看做有一座萬里長城的隔離，而不知是從前者轉到後者的馬列主義的路線。

這種極極端的思想雖然暫時給壓服下來，但却醞釀着未來「火併」的預兆！

一九二四年一月國民黨在廣州召開一大大會，實行正式改組，使它變成真正的民族革命聯盟；同時並接受共產黨所提出的「打倒帝國主義」與「打倒軍閥」的主張，與開始依靠羣衆的力量。在大會宣言中闡明革命的三民主義——民族獨立，民權自由與民生幸福。因此對內政策，聯共外，是扶助工農（意義在只有工農生活的改良，才更能動員廣大羣衆積極參加革命；只有階級鬥爭的發展，才能吸收最大多

數的民衆參加民族革命，使民族革命得到勝利——這就是民族偉大的潛伏力——因「貧乏之農夫，勞苦之工人……其所處之地位與所感之痛苦類皆相同。其要求解放之情至爲迫切，則其反抗帝國主義之意亦必至爲強烈，故國民革命之運動，必恃全國農夫工人之參加然後可以決勝……國民黨於此一方面當對於農夫工人之運動以全力助其發展，輔助其經濟組織使日趨於發達，以明增進國民革命運動之實力；一方面當對農夫工人要求參加國民黨相與爲不斷之努力，以促國民革命運動之進行……」——國民黨一全大會宣言——對外政策是聯合蘇聯及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

很明顯的聯蘇聯，聯工農三大政策的豐富內容使三民主義成爲新三民主義；它是在中國革命作爲社會主義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時代產生的。

大會後，在廣東，工農運動蓬勃起來了。不過革命的武力是不足以消滅國內的反對勢力與拱衛革命政權的，於是在嘉倫顧問的指導下，成立黃埔軍校，鍛鍊革命軍隊的幹部。

可是，帝國主義決不讓我們安心來鞏固革命的策源地的；於是就間接地掀起了軍閥和買辦階級對革命的反攻。

但革命政權並不脆弱；它以剝奪政策，在征服商團事變以後，馬上肅清東江，削平楊希閔，劉震寰，繼續又驅逐胡漢民，許崇清等……廣東境內的反革命勢力就完全肅清，基於國共兩黨合作的革命政權也日益鞏固起來。

三 從北伐到大革命的逆流

呂廣東革命政權建立以後，各處革命「潮」前湧後推地澎湃着——這特別在工人羣衆裏，大有不可遏止之勢。

原來各帝國主義國家的經濟在那時已由恐慌期朝向穩定期，它們就開始重新在中國進行大規模的經濟進攻；這樣，中國的經濟恐慌便爆發了！這，使得中外資本家更加加緊對中國工人的剝削；但另一方面，却引起一九二五年工人的猛烈鬥爭，展開對民族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的反抗。

二月，由於上海有名的小沙渡日本紗廠二萬多工人開始反資本，反帝的罷工運動，並且向青島播送火種，結果，工人勝利了！

然而五月在上海，因工人領袖顧正紅無辜被日本廠方槍殺，就引起全上海工人、學生、商人的反應，用罷工、罷課、罷市來反抗英日帝國主義「五卅」在南京路的大屠殺，同年六月十九日香港工人亦以大規模罷工來響應（堅持十六個月，結果英國下氣了）……但因民族資產階級的不徹底，妥協於帝國主義的利誘下，這次「五卅」鬥爭就沒能達到它所預期的收穫。

但是不論怎樣，「五卅」是一九二五——二六年中國革命高潮的開始，經過「五卅」的動員，經過與帝國主義劇烈的鬥爭，使革命的力量更加增強，吸引了更廣大的羣衆到革命的戰線上來，同時「五卅」

運動的經過提醒中國的工人階級深刻了解到要改善他們本身的生活，就要打倒帝國主義與本國的軍閥，並且要堅決反對投降妥協的本國資產階級。一點也不錯，「革命是擁有多末偉大的開明教育與組織的力量，革命數月能比政治停滯十年光陰所教育的公民，有時要更迅速而完滿。」（列寧，革命政府與革命軍隊。）可是正因為工人勢力的膨脹，就引起民族資本家的懼怕——這種下了後來大革命的逆流。

這，我們要提到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了，他「認為當時革命形勢（郭松齡反奉失敗後）在全國各處都受到了打擊，必須向右派讓步以保持聯合戰線。於是廣東驅逐出來的右派領袖，到了上海，共產黨中央却馬上與他們開聯席會議（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并訂立了如下的條件：「一、共產黨員在各級黨部指導機關中不得佔有過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數；二、由共產黨中央命令廣東黨部延慢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等候這些右派領袖回到廣東以後再開」（中國革命第一九——二〇頁。）

一九二五年三月孫中山的死，也使革命的發展受到了挫折。雖然孫中山在遺囑上指出：「……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在給聯共中央的信寫着，「我已囑咐國民黨進行民族革命之工作，俾中國可免帝國主義加諸中國的半殖民地狀況的羈縛，爲達到此項目的起見，我已命國民黨長此繼續與你們提攜。」

雖然一九二六年一月的國民黨二全大會通過了一個左傾的決議案，但不久的「三·二〇事變」以及五月十五日的「黨務整理案」的通過——限制共產黨活動——國民黨在開始右傾了。

教訓是什麼呢？照共產黨人的解釋，應當更堅決的在政治上擴大自己的政治影響，批評資產階級的動搖，積極的領導羣衆的鬥爭準備自己的力量，以鎮壓那不可避免的資產階級的反革命的到來，以便使這一革命轉到自己的領導之下。但他們的領導人陳獨秀却以爲要「包而不辦，退而不出」。

不過，由於共產黨的「讓步」，聯合戰線的裂痕還能彌補一時，但禍根却更加深了。

因爲帝國主義與軍閥的反革命戰線在醞釀，計劃中，所以進攻不單是答復而且是生路，在七月，歷史上有名的北伐就開始了。

因爲領導的正確與民衆的擁護，出發後不兩週就佔領長沙。由於毛澤東的努力，兩湖農民就組織起來，武裝起來，共有二三百萬人，工人也有七八十萬人——這時於北伐的進展是很有幫助的，所以在十月十日就攻下武漢。中國的南半部完全劃入革命的領域，工農運動更是突飛猛進。

真的，北伐軍做了羣衆革命火藥庫的導火線，稍一引燃，遂天崩地裂般的炸裂起來，誰也不能阻遏。

不過，那時在下層工作人員中，孫文主義學會（是國民黨右派主持的）與共產黨主義青年團間却發生領導上的衝突，這很快的也反應到上層的關係中間來。

一九二七年一月在羣衆的推動要求下，漢口和九江的英租界先後收回來了。這，羣衆力量的偉大，使帝國主義着急起來，同時，國民黨右派也懼怕它會壓到自己的頭上來。因此，在南昌攻下後，兩派間的裂痕遂沒法彌縫，而且，從那時起，在南昌，九江，安慶……已開展了殘殺工農的暴行。

在上海的勞苦大衆，爲了響應北伐軍，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四日的暴動失敗了，一九二七年二月二

十二日的暴動也失敗了，但三月三十一日的却得到了勝利，這是由於當時上海的革命運動，已經到了最高的頂點，廣大的無產階級已具有革命的決心，整個八十萬工人依靠着自己的力量，推翻了上海的反動統治，奪取了政權組織了，上海市民政府，這是民族革命聯合戰線中無產階級爭取領導權最高的表現。

假如主持者當時獨立堅決，暴動的勝利一定可支持更久的時間，甚至使中國革命轉變成另一樣的局勢，決不是不可能的。但由於領導者的錯誤——把鮮血與性命所取得的政權交給了資產階級，在暴動後沒有用最大的力量去爭取同情革命的士兵羣衆，武裝暴動也沒有得到上海近郊農民鬥爭的配合——這，就使勝利的暴動失敗了……

不過，上海工人這次英勇的鬥爭，更使帝國主義和民族資產階級恐懼。在帝國主義者看來，「軍閥不能作消滅革命的有用工具，於是用和平方法在革命勢力中找尋它的同盟，企圖叫醒民族資產階級，使之脫離革命戰線，以分裂革命的隊伍，以打擊革命勢力」（中國革命第二六頁）所以三月下旬向國民革命軍提出最后通牒，并炮轟南京。在民族資產階級看來，「反帝國主義戰爭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進行，超過了它的控制，客觀上危害了它的階級利益」（見前書同頁），「受帝國主義勾引就叛變投降了。這樣，民族資本家和封建地主，帝國主義就沆瀣一氣，企圖結成一個反革命的政治中心。

具體的表現，就是「四一二」大慘變；跟着廣州，南京，杭州……也發生同樣的殘酷的慘殺。

資產階級叛變以後，大革命的第一階段結束了，跟着是第二階段——工農小資產階級的聯合，自此以後，在中國南方就有了兩個營壘，兩個政府，兩個軍隊，兩個中心，武漢革命的中心及南京反革命的中心。

在國共合作下的武漢，以土地革命（沒收土地與國有土地）做主要的社會經濟內容，因為沒有廣大的農民熱烈參加，反帝國主義，反土豪劣紳，反封建地主與反軍閥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只有經過土地革命，才可以把中國從數千年政治經濟文化落后情形中解放出來，成爲新的國家。所以當時湘鄂贛三省加入農民協會的農民羣衆在一千萬以上，各地的農民自動起來打倒土豪劣紳地主，鄉村政權歸到農民協會；湖南農民已經自動起來奪取土地，革命怒潮把農村中最落后的羣衆，婦女兒童都發動起來；在城市中工人階級爲着本身經濟生活，也到處發展着罷工鬥爭——這工農運動的匯合與發展，使得小資產階級也動搖起來，武漢政府就日益右傾了。

五月，中共五全大會召開了，雖然有反機會主義的鬥爭，可是對國際路線仍是異常模糊的；所以陳獨秀仍然把持中央，使共產黨不但喪失自己獨立的政治面目，放棄儘情打擊小資產階級的批判，而且有許多地方（對設立地方政權，加強政治機構，武裝工農，軍隊政治教育，動員大衆……）完成變成小資產階級的尾巴。

汪精衛說：「工農運動過火，而陳也跟着狂喊『工農運動過火』了。所以在武漢的要求下，工人糾察隊解除武裝了，童子團解散了，湖南停止活動了……」

中共中央這樣的動搖，以「讓步」避免分裂，但結果却加重小資產階級的叛變。所以在夏斗寅的叛變，馬夜事變，以至最後唐生智的公開反對革命，武漢政府就開始和南京政府合流了。

武漢政府七月十五日的會議，公開宣佈與共產黨分裂；在「寧可在殺十人不可使一人漏網」的口

號下，工農遭受了空前的大殺戮。這些反革命的劊子手，真可與「四一二」媲美一時！

民族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結合，共同脫離了革命陣營，完全投到了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懷抱，從此中國實際統治又落於帝國主義之手，工農遭受空前的恐怖，國共分裂，中蘇邦交斷絕了……

大革命的第三階段是這樣在不榮譽的「七一五」後結束了，大革命是失敗了，但它的原因在那兒呢？一九二八年中共六大會總結着：

在客觀方面，由於——一，帝國主義的力量強大；二，民族資產階級背叛革命；三，地主領導的軍隊力量很大；四，是工農運動發展的不平衡；五，小資產階級的動搖；最後，主要的却是由於主觀上陳獨秀機會主義的錯誤，這，毛澤東在他的自傳裏這樣批判着：「陳獨秀應負責最大的罪過，因他的動搖的機會主義，使共產黨失掉了決定的領導的作用，等到當繼續妥協將要招致災禍的時後，又使共產黨失去了路線。」

但革命任務所未完成的部分由誰來繼續與完成呢？中國革命由此必然踏進一個新的階段！

四 一個答覆：展開蘇維埃的旗幟

在「七一五」後，共產黨人認爲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使黨受到莫大的打擊，政治上已經走到絕路，黨在羣衆中的威信幾乎完全喪失；組織上已經走到分崩離析的狀態，一般同志無所適從。」於是有了八七緊急會議的召集，共產黨人認爲這一會議是中共在歷史中轉變的關鍵，它堅決批評過去中共指導機關的機會主義錯誤。同時在政治上指出武漢失敗使革命又受了一次打擊，但是由於階級關係的新變化，革命便必然向着新的階段——工農革命的階段發展，而革命的責任也便不得不落在工農階級以及共產黨身上了。八七會議堅決地決定了新的策略，提出了暴動推翻反革命的統治，建立蘇維埃政權，實行「土地革命」的總方針；在組織上提出了「澈底改組黨」使走上布爾塞維克化的道路。這樣，爭取千百萬羣衆進行鬥爭，爭取革命高潮的到來。

中共六大會根據了這些總方針，規定了十大綱領：一，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二，沒收外國資本的企業和銀行；三，統一中國，承認民族的自決權；四，推翻軍閥反革命政府；五，建立工農兵蘇維埃政權；六，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增加工業救濟失業，與社會保險；七，沒收一切地主階級的土地；八，改善兵士生活，發給兵士土地和工作；九，取消一切軍閥政府和地方的捐稅，實行統一的累進稅；十，聯合全世界無產階級及蘇聯。

只能而必該這樣做，「不是爭鬥就是死，不是血淋淋地鬥爭就滅亡。問題不可避免。地這樣提出來

所以儘管武漢政府這樣的反動，帝國主義和反革命力量的聯合怎樣企圖絞殺中國革命，但革命的第一個答覆是八一的南昌暴動——這是以武裝力量保持革命勝利的第一次自衛戰爭的嘗試。

當天，賀葉軍解除了朱程的武裝，跟着就迅速地佔領南昌，成立革命委員會，然而因機會主義的殘餘在作祟，很快的退出南昌……不久在三河壩給粵軍擊破了。這就結束了與左派最後的聯合，以後，在中共的旗幟下獨立地領導中國革命。

跟着，二湖的秋收暴動是農民直接回答軍閥，地主，民團進攻的行動。它是由毛澤東領導的。毛在綱領中號召五點：「一，省黨部和國民黨完全脫離；二，工農革命軍的組織；三，大中地主財產的沒收；四，在湖南建立共產黨的勢力，和國民黨完全脫離；五，組織蘇維埃。」（毛澤東自傳）結果失敗，毛被俘，後來逃脫。

這次暴動在許多地方將土地革命的口號滲入廣泛的農民羣衆的意識之中，這對後來的蘇維埃運動可以說是盡了播種的任務。

此外，彭湃領導下的海陸豐農軍於十月卅一日佔領海陸豐；在暴動勝利後，即沒收和分配地主的土地，并在十一月七日在海陸豐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蘇維埃政權。

在大革命失敗過程中，中國無產階級會給反革命以最有力的回答，這便是廣州無產階級的武裝暴動，這一暴動總結了中國的大革命，成爲革命形勢低落過程中「退兵的一戰」，同時如八七會議所指示的，開闢了中國革命的新階段——中國蘇維埃階段。

十二月十一日早，在中共領導下，暴動開始了。當天就完全控制廣州市，跟着就成立蘇維埃政權——蘇兆徵和張大雷分掌政治與軍事。同時公佈蘇維埃政綱，在三天內已有許多政策見諸實行。

但因準備得不够——對工人、農民、軍隊的聯繫工作做得不够，這在張大雷陣亡之後，尤其表現得明顯，於是在中外反革命的聯合力量的進攻之下，十三日廣州公社坦台了。

「廣州蘇維埃的出現，不僅在中國蘇維埃運動上有着重大的意義，而且在全世界的殖民地革命運動上也有極大的意義。它告訴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只有建立民衆自己的蘇維埃政權才能取得解放。」（中國問題第一七二頁）

「廣州公社……是在共產黨領指下的工農羣衆爲在蘇維埃旗幟之下解放中國人民英勇的企圖。它雖然遭受了嚴重的失敗，但它所舉起的蘇維埃旗幟，確成了中國千百萬勞動羣衆奮鬥的旗幟。」（論抗日救國統一戰線第三三頁）

「廣州暴動已經深入勞動羣衆的意識之中，這是中國工人之偉大的英勇的模範。將來廣泛的工農羣衆暴動，組織在列寧主義的澈底堅決的旗幟之下的，得到國際無產階級之贊助的——必定要成爲中國之勝利的十月革命。」（廣州公社第二六頁）

中國革命雖然在「一二·一一」後臨到了它的低潮，但事實上自廣州公社正式建立蘇維埃政權，展開它的紅旗後，各地蘇維埃運動風起雲湧起蓬勃起來了。

五 自相殘殺的圍剿時期

一九二八年秋，中國大體上是統一了，可是這只有統一的外貌。就國民黨本身來說，各實力派都還是同牀異夢，互相猜忌，最後就掀起了大規模的循環式的內戰，這一直延長到一九三〇年。結果，桂（李白）馮閻……失敗了；蔣勝利了。

在同一時期的，由於國民黨內的戰爭，國際經濟恐慌的爆發，罷工浪潮就顯著地高漲着；農民遊擊運動也一天天展開着……這些都助長了紅軍與蘇維埃運動的發展。一九三〇年，毛澤東和朱德會合於井冈山，建立了中國紅軍的基本核心——紅四軍，決定了「敵進我退，敵止我擾，敵避我擊，敵退我進」的游擊戰基本原則。蘇維埃的根據地在鄂豫皖湘贛……獨立地組織起來，到一九三〇年已有十九個蘇區，其中以閩粵贛邊蘇區為最大。這些「燎原赤禍」確給京南以非常大的威脅。

南京方面既已明瞭江西蘇維埃的革命潛勢力，爲了鞏固統治，就決定對紅軍進行有計劃的圍剿，以便消滅紅軍。

但在共產黨方面，由於李立三路線，却玩弄着暴動。進攻長沙未了，又發動進攻南昌武漢。這使革命招致不必要的損失。這違反了六大大會的中國革命首先爭取一省或數省勝利的決議；否定了中國革命發展的不平衡性——由於帝國主義統治的不同，各地經濟發展的懸殊，主觀勢力的不同與地域的不同就

構成中國革命發展不平衡的根據。但立三路線很快的被清算，這才保持了年青紅軍的力量。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第一次圍剿開始了。南京動員了五萬之衆，分五路進兵，但紅軍巧妙地運用運動戰略——迅速集中和迅速分散——誘引中央軍深入，然後攻其弱點。同時在蘇區內部，肅清了反革命力量（所謂A B團等），使自己更團結和鞏固起來。四萬人的紅軍到了一九三一年已把對方完全擊潰。僅僅停止了四個月（五月），第二次圍剿又開始了。這次動員了二十多萬人，分七路進兵。結果，由於紅軍在戰略上運用的靈活，不上一個月功夫，七路中央軍都各個地給打退了。

七月，蔣介石親自督領大軍三十萬，進行第三次的圍剿。他以為可用急速的「掃蕩」來佔領蘇區，就迅速行軍，深入到蘇區的中心。然而這却是戰略上的失敗，因為紅軍以三萬兵力，個別地擊敗對方，並俘虜了許多的「白軍」，獲得了大批的軍火，機關槍和其它武器。南京軍受了紅軍的「軍械輸送隊」之譏。第三次圍剿失敗了。

此後，轉入比較和平的一個時期。

是年十一月七日在瑞金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大會發出通電：「本大會代表全國工農兵在赤色的江西開會成立中央蘇維埃政權。」它「是反帝國主義的政權，大會號召全國……勞苦羣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滿洲，屠殺羣衆，推翻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消滅反動統治，保護蘇維埃。」

跟着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毛澤東當選爲主席，朱德當選爲紅軍總司令。

十二月一日，中華蘇維埃政府發出通電，指出它受大會的付託，『爲竭全力執行大會決定的政綱，憲法，勞動法，土地法等一切法令和決議，建立而鞏固廣大的革命根據地，創造大規模的紅軍，組織大規模的革命鬥爭，使革命在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以至於全國取得的勝利。』

經過這次大團結後，紅軍的力量更加增強了。但更重要的是十一月十六日發生了大規模的寧都兵變。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全部譁變，來參加紅軍的隊伍。這次譁變，誠如二十六路軍革命士兵委員會的敬告全國士兵兄弟書所指——『希望各地的士兵兄弟接到我們的報告後，立即開會慶祝我們廿六路軍的兄弟找着了出路，得着了解放，更希望你們高舉紅旗像我們一樣殺掉反動的長官投向紅軍中來，我們正準備來歡迎你們！』——使南京大大的感到威脅。

大會後，有一個很長的「休息」時期。中共六大大會所決定的十大綱領，雖在軍事進攻和經濟封鎖的困難環境下，許多在蘇區是實現了——沒收封建地主的土地，無代價的分給貧農；取消一切苛捐雜稅，實行統一的累進稅；取消中世紀奴役的高利貸，用無利與低利的借款滿足農民的需要；取消一切帝國主義的特權；給予勞苦大眾空前未有的民主權利；建立真正廉潔的政府機關（最高薪給不得超過每個工人農人的收入）；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增加工資，失業救濟和社會保險；紅軍官兵生活完全平等；優待紅軍家屬；實行免費教育，消滅流氓乞丐與失業者……

這是中國的新的奇蹟。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一日第二次中華蘇大會便充分表現了這些。這是一面抗戰一面建國的先例。

第四次圍剿開始於一九三三年四月。雖然南京動員了許多精銳的部隊，但由於戰略上的失當，却遭受了空前的慘敗。被擊潰的若干師，被解除武裝的若干師（連精銳的十一師也在內），甚至二個師長也被俘了。陳誠對人說：和紅軍作戰，不是一種「終身的使命」，而是一種「死刑的宣告」，這不是說國力不應消耗在自相殘殺的內戰中嗎？

就幾次圍剿的對外影響來說，第一次，第二次使中國喪失了東北；第三次招致了淞滬抗戰後的淞滬協定；第四次却更使中國蒙上了塘沽協定的恥辱；……南京一貫的「安內」政策，損失的還是中國本身。關於紅軍以少數敵衆的那種不可戰勝的力量，我們可以這樣觀察：不僅僅是戰略的成功和戰術的靈活，首先是得力於戰士的高度政治覺悟和廣大羣衆的擁護和幫助。關於這，我們可引一九三三年六月蔣在會見日本中央公論雜誌的特派員的一段談話：

「朝向着使我們的後方部隊發生困擾和對軍需部隊給予突擊……他們（指在蘇區內和它的周圍的農民們——健）幹着偵察，鼓勵我軍起不滿情緒，另外掩蔽正規紅軍的所在地。他們儘所有力量用各式各樣的破壞我們的計劃……當戰鬥停止，他們就在田裏幹活，但當需要時他們就武裝起來，援助共軍。」

「我軍可不能，但只感覺到敵人潛伏在各個角落裏，就是對於共產黨還沒有活動的區域的老百姓，我們也感到不安寧，除非全部人口給消滅了。」（轉錄自A. Smedley: *China's Red Army Marches*）

我們知道民衆是無罪的，他們在蘇區的正確領導之下，得着了人的生活 and 保證，但是這是當時中國

的統治者所不滿的。無辜老百姓很多便這樣地給殺死了。相反的，這也證明了蘇維埃政權和革命的政黨與軍隊是與「中國人民有着根深蒂固的聯繫，不屈不撓地擁護中國人民的利益。」抗戰的勝利必須依靠廣大的民力，這裏也有了先例。

「經過四次圍剿的教訓，南京就接受德國顧問 Von Seeck 的建議，在美國的經濟幫助（棉麥借款）下，採用新的戰術和戰略——封鎖（是使軍隊和民衆隔離開，同時不靠近紅軍的防區，這爲的是防止軍隊的「轉向」）和防禦建築的制度。於是一九三三年十月就動員了百萬大軍，進行第五次，也即是「最後一次」的圍剿。

在這次圍剿中，蔣介石用他的軍隊，實行嚴厲的封鎖，整個包圍了蘇區，他很小心地前進，建築汽車路，碉堡和戰壕。他避免把他的主力軍隊接近紅軍。他們謹慎地在防禦工事後面作戰，他們只作短距離的前進，并用飛機，大炮，坦克和機關槍掩護着」（引自西行漫記）。

但紅軍却犯着兩個嚴重的錯誤——一個是在一九三三年，福建人民政府事變中，沒有能和蔡廷鍇加緊的聯合；一個是放棄了那靈活的運動戰術，而採取錯誤的單純防禦戰略。於是蘇區一天吃緊一天了。由於國民黨軍隊驚人的數目和技術的優越，由於當時民族的政治情形，特別是日本加緊向中國侵略，危害到中華民族的各階層——這，逼使紅軍放棄江西，將他們的活動，也就是使命，移到國防前線的西北去。

十月十六日夜，就開始突圍，北上抗日，進行他們二萬五千里長征。

力。

雖然南京逼使紅軍放棄了江西蘇區，但在圍剿的整個意義來說，是失敗了，因為並沒有消滅紅軍全力。不過，都以一等的軍隊，一等的武器，消耗在那「無期徒刑」的內戰中，這不太便宜了日本帝國主義。

六 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根據

一九二四——二七年以國共合作爲基礎的反帝反軍閥統一戰綫，在民族資產階級與部分小資產階級的動搖與退出之下破裂了。這使快要完成的民主革命遭受失敗。此後，中國雖在形式上已告統一，但連年却在革命與反革命，自衛與圍剿的內戰中。

這些無數次的內戰給帝國主義一個很好的機會——加緊對中國經濟侵略。一九二九年秋以後，全世界各國（蘇聯除外）都遭遇到空前的經濟大恐慌，這一方面它們建起關稅壁壘。一方面則加緊掠奪殖民地以解決自身的危機。

日本雖在歐戰期間發了洋財，還能掙扎一時，但它究竟是先天不足的，在一九三二年也捲進經濟恐慌的漩渦了——這就引起它國內經濟危機之加深與勞資矛盾的增長。同時，那年是中國正在進行大規模的剿「匪」戰爭的一年，也是歐美經濟恐慌最嚴重的一年。日本法西斯軍閥就按照「田中奏摺」利用這時機，在萬寶山事件與中村失踪案的藉口之下，向中國投躬第一個「火藥」彈——九一八夜發動瀋陽事變——用對外戰爭來降低或消滅國內革命危機。

但那時，南京政府還太信賴國聯，以爲瀋陽事件一樣能像一九二九年事濟南事件那般「和平」解決，就實行不抵抗政策。結果，整個肥沃的滿洲在三十天內淪亡于太陽旗下。

歐美完全沒有反應相反的英國却懲思侵略中國——爲的是反蘇——所以日本爲進一步強迫中國訂立「城下之盟」起見，便在一九二九年一月廿八日在上海擲下了第二個「火藥彈」。這回，英勇的十九路軍却不甘示弱而執戈抗敵。這使全國同胞，尤其是海外華僑，大大的興奮了。他們以精神和物質來支持這支孤軍，使它能夠頑強地抵抗到卅四天。但南京政府的一部份人（特別是汪精衛之類）在「鎮靜」「長期抵抗」「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棍子之下，犧牲了這次神聖的抗戰——這就是五卅慘案協定的簽訂。

九一八以後不久，第一次中華全國大會通電號召全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滿洲，屠殺羣衆……」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日中華蘇維埃政府發出對日宣戰通電：「……已正式宣佈對日戰爭……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號召全國工農兵及一切勞苦大衆，在蘇維埃的紅旗之下，一致起來，積極的參加和進行革命戰爭……來實現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反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澈底爭得中國民族真正的獨立與解放。」一九三三年一月十日，紅軍更進一步地宣佈在三個條件之下——一，立即停止進攻蘇區與紅軍；二，立即給民衆以民主自由；三，允許民衆有組織抗日義勇軍和武裝的自由——同全國任何軍隊訂立抗日協定。

但南京權威方面却公開聲明：現在誰再談抗日，就是不可赦的民族罪人。結果決定了一先安內後攘外的國策。

事實的發展並不如一般淺識的人那般打算，以爲日本除了滿洲以外，「對華無野心」——一九三三年

因沒有遭遇多大抵抗就佔領了熱河，便殺到長城來了。結果，五月卅一日簽訂了塘沽協定。

一連串的恥辱，使全國人民對於當前的國策發生懷疑了。

一九三三年春，東北義勇軍統一而組成東北抗日聯軍，夏，察哈爾成立抗日同盟軍，冬，蔡廷楷等在福州呼籲抗日，成立了人民政府……一九三四年五月，上海各界名流公佈了「中國人民對日作戰基本綱領」，更重要的，當是同年十月，紅軍自動放棄江西蘇區，北上抗日——這樹立了團結抗日的先聲。

由于「朱安內，後攘外」國策的錯誤，一九三五年是中國國難最嚴重的一年了！五月二十九日被迫簽訂的何梅協定，不僅逼使中央軍自河北省撤退，嚴重的却在取消北平軍委會分會，河北省長官的委任要得日本的同意，封閉河北省國民黨省黨部及停止其活動……日本的干涉中國內政赤裸裸的顯露了它的野心。

六月，日本開始在經濟上以「走私」的姿態來打擊中國的工商業；在政治上，則強迫以親日官僚來代替國民黨進而操縱中國的內政。七月，更陳兵華北，以助成它經濟上和政治上的要求。

這些陰險的毒計的後果是什麼呢？

第一，馬上引起全國同胞的反應，都認為擺在中國的前面，抗日才是急務了。

第二，就是國民黨人，中央軍和部份政府要員也都怒髮沖冠起來，因為這一種莫大的侮辱是任何人所不能忍受的。他們在腦海裏縈繞着——抗日，安內，那個在先？在東北，由于國共的親密合作，抗日聯軍起了很大的作用。爲什麼在關內不是這樣呢？他們的抗日決心高漲起來了。

第三，就是我們認爲「最脆弱的」民族資產階級，日本在這樣地縮小與併吞他們的市場，在「走私」而使他們日趨破產之下，部份的也覺悟到妥協是絕望的了。

「安內」國策實有加以重新檢討的必要。

再，由於日寇的加緊進攻，中國民族的敵人已經不是各帝國主義的國家，主要的而是日本一國了。因爲它們在遠東原野上，無論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利益，都與日本獨佔中國的政權相衝突，而發生了不可彌補的矛盾，它們爲了維護在中國（和遠東）的利益，就反對日本對中國的剝奪和獨吞政策，而同情和贊助中國的統一與和平了。那時，國際間正有着和平陣線（由蘇聯和全世界酷愛和平的大衆主催的）和侵略陣線的明顯的對立。沒有問題的，英法美是站在前者，因此日本和其他各國矛盾促成了中國與其他各國的友誼關係，反而使日本孤立。這助成了中國的統一戰線和「抗日第一」的國策。

再，由於中日間民族矛盾的加深，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國內階級間與政黨間的矛盾，使國內矛盾變爲次要的和從屬的矛盾。中國的階級關係變化了，民族矛盾超過了階級的矛盾，各階級爲了共同的利益和生存就不得不改變它們的政策。大家都覺得：「現在不僅工人階級，農民和一切勞苦大衆，更加日益覺悟到必須爲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而進行堅決的鬥爭；不僅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羣衆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的壓迫，反對失業的痛苦，反對饑寒交迫的境况；而且有很大一部份民族資產階級也日益迫切地感覺到，必須採取決定辦法，來阻止日本帝國主義貪慾無厭的侵略。來挽救國民經濟繼續不斷的崩潰。」（王明：抗日救國政策）因此，只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才能挽救中國的危亡。

這個抗日救國的大問題蘊藏着和跳躍着在每一個不願做亡國奴的人民的心頭。八月一日，在共產黨有名的「爲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八一宣言）中把它靈情地宣佈了：

「近年來，我國家，我民族，已處在千鈞一髮的生死關頭，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抗日救國已成爲每個同胞的神聖天職！

……同胞們！中國是我們的祖國，中華民族就是我們全體同胞！我們能坐視國亡族滅而不起來救國自救嗎？不能！絕對不能……

因此，當今我亡國滅種大禍迫在眉睫之時，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再一次向全國呼籲：無論各黨派間在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意見上或利益上的差異，無論各軍隊間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敵對行動，大家都應該有「兄弟鬩牆，外禦其侮」的眞誠覺悟，首先大家都應停止內戰，以集中一切國力（人力，物力，財力，武力等）去爲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

大家起來！冲破日寇××的萬重壓迫，勇敢地……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組織全中國統一的抗日聯軍……

爲的使國防政府眞能負責國防重任，爲的使抗日聯軍眞能担負起抗日重責……有錢的出錢，有鎗的出鎗，有糧的出糧，有力的出力。有專門技能的供獻專門技能，以便我全體同胞總動員，並用一切新舊式武器，武裝起千百萬民衆來……如果我們四萬萬同胞有統一的國防政府作領導，有統一的抗日聯軍作先鋒，有千百萬武裝民衆作戰備，有無數千萬東方的和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和民衆作聲援，一定能戰勝內

受人民反抗和外受列強敵視的日本帝國主義！

這宣言證明了以國共合作爲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具體形式和內容；它是抗日的，不是反對一切帝國主義，而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因爲日本正在向中國進行侵略；它是民族的，包括一切黨派和一切階級，除了漢奸以外。這宣言要求首先停止內戰，訂立各黨派抗日救國的政治綱領（它們除服從于共同綱領之外，還保持自己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以便共同進行抗日鬥爭。

這宣言是中共新政策自九一八以來的更具體化，更豐富化的表現。這個政策以國家民族的前提，匯合了各黨派，各階級的利益與要求成爲抗日救國的一個總的主流。

七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八一宣言」發出後，馬上就傳佈到全國而引起深切的注意和熱烈的同情。大眾的共同要求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但日本却懼怕着中國的團結和統一。它以共同防共來引誘南京政府，並造出無數的地方事件（特別是上海水兵案）以威脅南京就範。南京徘徊在二可之間。

十一月，國民黨五全大會召開了，投降路線的發明人與領導人雖因公憤而受狙，但對於禦侮救亡上面，大會也只規定了「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不輕言犧牲；」在對內方面，大會決定努力「近代國家」的組織……這樣說來，大會的目標仍是集中於「安內」——所謂「近代國家」的「統一」運動。

同時，日本却於十一月廿五日一手造成「冀東防共政府」這是以防共統一戰線來對抗中國的抗日統一戰線的開始。

由于冀東防共政府的成立，南京開始驚駭而覺悟到在這個時兒，用這樣的方法來建立「近代國家」是不可能的。

學生羣衆（特別鄰近通州的北平學生）激怒了。於是引起一二九和一二·一六的二次英勇壯烈的

示威——這是八一宣言從政治鼓動到具體行動的開始。他們在主要口號是「立刻停止一切內戰」——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集中全國軍事經濟……的力量一致抗日」……

全國各界不僅學生就是工人，知識份子，商人都起來支持與擁護這一運動，於是熱烈的救亡氣氛充滿了全中國。

我們知道：「日本帝國主義，不只全副武裝，而且是奸險狡猾……關於利用中國內部的一切鬥爭來實現它的掠奪的目的。」（季米特洛夫）它見到寧粵間的不滿，就暗中以軍械和「銀彈」供給西南，再度釀成國民黨間的內戰。另一方面，日本却與南京進行談判，企圖「一箭雙鷗」。

在這樣的親日不抵抗政策之下，就釀成一九三六年六月西南的出兵「抗日」。但抗日是全國一致的要求，所以全國人民督促他們，要求他們的諾言兌現，這使借假名義變成有意識的行動。同時，南京也了解人民的要，就不得不用各種方法來避免戰爭。

國民黨二中全會不獨不於七月中倉卒召集起來，宣稱「吾人對內唯有以最大之容忍與苦心，斡求全國國民之團結；對外則決不容忍任何侵略領土主權之事實，亦決不簽訂任何侵略領土主權之協定。遇有領土主權被侵害之事實發生，如用盡政治方法無效，危及國家民族之根本生存時，則必出以最後犧牲之決心，絕無絲毫猶豫之餘地。」西南事件就這樣在大會同意抗日的原則之下和平解決了。這使中國更進一步地團結起來；同時也使國民黨的一貫「安內」政策有了部份的修正。

但「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口號仍從西北普遍地吶喊出來。這是中國的新生的呼聲！

我們知道，紅軍是一九三五年十月到達陝北的。十一月東北軍就吃了好幾個大敗仗，論萬的人投到紅軍那邊去，並受了一時期的「抗日的教訓」。有的回來了把紅軍那種誠懇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專實和「人中國不打中國人」「跟我們聯合起來打回東北去」的口號傳佈到全東北軍的軍官和士兵羣裏去。東北軍受感動了！

就是東北軍總司令張學良本身，也開始認識了剿滅共產黨是不可能的，而剿共的戰爭如果繼續下去，抗日也是不可能的。這就覺定了他的聯共抗日的主張。

一九三六年春，張學良飛到延安，會見了周恩來，經過了長時期的交換意見以後，張便相信了紅軍的抗日誠意，並相信他們的統一戰線的提議是正確的而可以實行的。

六月，東北軍、西北軍和紅軍間就成立協定，同意停戰。同時紅軍政治工作人員被邀南來，進行改造東北軍與西北軍，提高他們的政治水準。

本來，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廿五日，共產黨就發表了組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決議，「爲了使民族統一戰線得到廣大的與強有力的基礎……把自己（蘇維埃工農共和國）改變爲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把自己的政策的許多部份改變到更適合于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變中國爲殖民地的情況。」在一九三六年春紅軍的山西行動中，已停止了一般的「打土豪」的政策，組織了「抗日救國委員會」。

二月二十一日，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通電全國：「今特主張立刻召集全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正式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開始實行抗日戰爭的具體步驟。」跟着當他們知道蔣確實有轉向抗日的

可能時，就放棄了「反蔣」而提出「聯蔣」的口號了。

五月，抗日紅軍被阻山西，就回師陝北，乃於五日發出宣言：「……國難當前，雙方決戰，不論勝負誰屬，都是中國國際力量的損失，而爲日本帝國主義所稱快。……爲了保存國際實力，以便迅速執行抗日戰爭，爲了堅決履行我們屢次向國人宣言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然仍將人民抗日先鋒軍撤回黃河西岸，以此行動向南京政府全國海陸空軍，全國人民表示誠意，我們願意在一個月內與所有一切進攻抗日紅軍的武裝隊伍，實行抗日議和，以達到一致抗日的目的。」

由于西南事件的和平解決，資產階級及國民黨的明達份子開始向着抗救國日的方向轉變，而共產黨更毫不遲疑地向着他們的鬥爭了十年的對手，伸出了友誼的手，因于八月廿五日進一步地對國民黨中央送致了一封有名的公開信，要求國民黨中央的覺悟與改變過去的錯誤政策。信上說：「立即停止內戰，組織全國的抗日統一戰線，發動神聖的民族自衛戰爭……和平早已絕望，犧牲早已到了最後關頭，除了發動全國人民全國武裝力量的堅決的自衛戰爭外，中國領土主權的全部淪亡是無法挽救的……恢復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精神，重振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與農工農三大政策……假如你們真正這樣幹的時候，我們是堅決的贊助的，我們願意同你們結成一個堅固的革命的統一戰線……現在全國人民盼望二黨重新合作共同救國之心是迫切到了萬分，他們相信只有國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國各黨各派各界的總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圖存……現在是已經到了決定的關頭了……國共合作的關鍵，現在是在貴黨的手中。」

跟着，九月十七日共產黨宣布了在中國建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決議：「因為這是團結一切抗日力量來保障中國領土完整和預防中國人民遭受亡國滅種的殘禍的最好方法，而且這也是從廣大的人民的民主要求產生出來的最適當的統一戰線的口號。」

共產黨方面還派出代表和國民黨方面進行談判。經過了多次交談。但對問題的解決還不得要領。僅僅這些，已使日本帝國主義懼怕起來了。它急不待擇，於十月中指揮蒙偽軍向綏遠作探討戰。當時南京政府不但不接受人民大眾的要求，即「最後限制」已越過了，只有動員全國，才能挽救這危局，反仍徘徊於它的一貫的政策之繼續施行。

大眾等不起了。許多愛國團體開始請求南京政府接受共產黨停止內戰與建立統一戰線的建議，以便集中全國人力，物力，財力，武力，與智力，共同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新的進攻。

具體的反映，也集中於西北。統一戰線的宣傳與工作已在實踐中。在西北，中央軍固受綏戰的刺激，更加上紅軍誠意的有力宣傳，他們對內戰感覺到疲倦與乏味，就開始「怠戰」起來。

「只有抵抗外來侵略，真正的中國統一才能出現。」「如果政府不服從民意，它就不能存在。」「如果共產黨能夠誠意合作，抵抗外來的侵略者，或許這一問題能夠和平解決。」——張學良已明顯地表示勸告蔣介石領導積極的抗日。

這是以「抗戰求統一」來直接答復以「統一求抗戰」的謬論，這不僅是西北人民的意志，而且也是

是全國人民的一致主張。

全國人民大眾最後決定歷史的方向：內戰和抗日。

八 中國歷史繼續的轉捩點——「西安事變」

由於綏戰，在西北已瀰漫着停止內戰，援助抗日的綏戰的氣氛；這個主張很迅速地傳染到中央軍來了。但南京領袖們仍舊沉緬于他們的一貫政策。十月，蔣介石親到西安。他馬上發覺了東北軍對於劉共已不感興趣，就調他的最精銳的第一軍作爲進攻甘肅紅軍的先鋒，以履行他計劃中的所謂肅清「殘」共的第六次也是最後一次的圍剿。

那時，全國紅軍主力——第一，第二，與第四方面軍——已全部會合于西北，以準備實踐他們北上抗日的諾言。這次意外的攻擊並沒有減低他們的堅決的初衷。

十月廿六日，他們發出有名的「給蔣總司令及國民革命軍西北各將領書」，說明：「我們敢從軍人的坦白與熱忱敬告諸先生：中華民族已經到了最危急的時候，「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望諸先生懸崖勒馬，立即停止進攻紅軍，並與紅軍攜手共赴國防前線努力殺賊，保衛國土，驅逐日寇，收復失地……只要貴黨貴政府決心抗戰，紅軍願作前驅，並與你們合作到底……民族危急已到了最後一剎那了，內戰還是抗戰，決定的關鍵是操在諸先生的手裏！全中國人民所希望于諸先主的是奮起抗戰的民族英雄，不願諸先生繼續內戰成爲民族罪人！尤其希望蔣先生毅然決然停止進攻紅軍的「最後內戰」，率領全國的武裝隊伍實行抗戰，以復活黃埔的革命精神，以恢復國共合作時反帝鬥爭的勇氣。抗戰發動得早，是中國民族

的大幸！即萬一不蒙諸先生採納，我們亦必以千迴百折赴之，不達目的，決不罷休……」

可是南京的第一軍還是節節進迫，紅軍一面引退，一面宣傳……一直退到將近連河灣。到了那地方，他們決定不再退下去了，必須給予應有的回擊。十一月二十一日，第一軍全部慘敗，二個師做了俘虜；但經過了「抗日的教訓」後，就全部解釋。這激怒了蔣委員長，他更決心于加緊圍剿工作。

十一月，上海幾家本日本紗廠工人罷工。日本藉口救國會，在鼓動與支持這一運動，向南京抗議，要求取締沉日團體。結果，南京屈服，工潮被壓制，救國會的七個負責人給逮捕了。 也罷了

由于這些事實的反應，東北軍就逼迫張學良向蔣委員長發出赴綏遠前線投効的呼籲，跟着，張親自飛到洛陽，重提出這些要求。雖然沒有結果，但却成就了一項使命——蔣答應下次來西安，對東北軍詳細解釋他的計劃與戰略。

十二月七日，蔣委員長與參謀部要員會合于西安；東北軍與西北軍開却商量妥當，準備提出取消內戰與反抗日本的一致要求。

局勢一天嚴重一天，似乎無法挽回厄運。一二九那天，西安幾千學生舉行反日遊行，前往臨潼，向蔣氏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要求；可是在半途，不但給憲兵棍打，更加以槍擊。二個東北軍軍官的子弟重傷了，張學良就出來干涉。他一面勸告學生回城，一面拍胸向學生說：「我張某負担在這幾天內給事實你們看！」（西安事變真相）

八、九二日，蔣分別接見東北軍與西北軍將領，想用種種方法，拆散他們的聯合。但他是失敗了！他們都

承認蔣氏是最高統帥，但每個人不但表示不願參加道自相殘殺，耗糜國力的新總攻，反而一致要求把他們送到遠綏抗日前線。

然而蔣爲他的一貫政策所纏綿，悍然不顧一切在十日那天，召集參謀部會議，正式商定第六次圍剿的最後計劃，並宣布在十二日公布勳員令，一面公開聲明：假如張學良拒絕命令，他的軍隊就要由中央軍來解除武裝，他自己也要被褫職。

內戰是滅亡和平昇生機，在這不可分割的界限中，張學良和楊虎城見了事已至此，就在十日那天秘密下令，調東北軍一師和西北軍一團開至西安城郊，以防萬一。十一日晚上十時張楊召集東北軍與西北軍的聯席會議，當席一致贊同聯共抗日，爲澈底貫徹他們的正確主張起見，就決定先發制人，在十二日那天實行「兵諫」，以促蔣委員長的最後覺悟。

由于方法的巧妙，迨至十二日早上六時，全部事件都已完成。憲兵團全部被解除武裝，蔣委員長及隨從的軍政要員也毫無遺漏地被扣留。

跟着，在西安組織西安臨時軍事委員會，並由張楊策東北軍與西北軍各將領聯名向南京政府各省領袖及全國人民發出通電，除保證委員長的個人安全，「爲促成他的覺悟……應讓其目前暫留西安」外，還提出下列著名的八項主張：

- 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負救國責任；
- 二、立即停止一切內戰，與採用武裝抗日的政策；

三、釋放上海被捕七愛國領袖；

四、釋放一切政治犯；

五、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自由；

六、保障人民愛國組織權利與政治自由，

七、立即實現總理遺教（聯俄，聯共，工農政策）；

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這些主張正是當時的需要，因此不久就獲得全國大衆廣泛的擁護。

但蔣委員長被扣的消息和張揚的通電到達南京以後，那些軍閥官僚政客與德意顧問就沉瀝一氣，熱烈主張討伐，準備在「擁蔣」的口號之下，以遂他們奪取政權的陰謀。

十三日晨，日本駐中國大使川越茂爲着這事，兼程晉京，游說那班野心家；他們在個人利益超過民族利益的前提下，接受了日本的「誠意」——一面準備下討伐令，繼續內戰，一面即電五全大會被狙去國的投降路線領導人汪精衛趕日趕程返國，主持他們幻想中的「新政權」。日本蒙養下的德王也表示擁護南京，停止綏戰，共同討「逆」。

所有這些還不是一個大大的陰謀嗎？

但全國人民決不同意這種內戰，而一致擁護和平解決。羣認張揚的行動雖嫌粗率，他們的主張却是正確的。這在南京的賢明黨政軍委員也抱着同一的見解。

不過，究竟陰謀家力量雄厚，他們握有大部權力，更何況少壯軍人在委員長的「侮辱」下來支持他們呢？雖然蔣夫人以她丈夫的安全「實與國家之生命，有不可分離之聯系」（見西安半月記）來貽責陰謀家們，但討伐令畢竟于十六日發下了。

決定和戰的關鍵，始終在于西北。十六日張學良以羣情紛紛，就以自備飛機迎取中共代表周恩來等來西安。對於這個突發的西安事變，共產黨在事前是全不知道的，在事後也是未與謀的。他們驟聞事變，就深懼兵禍連結，必然要給日本帝國主義一個最好的侵略機會，中國也許因而會亡國。這樣說來，假如全國性的內戰爆發起來，不僅與共產黨與無產階級的利益一無是處，而且與全國人民的利益更不相符合。所以，在中共代表團抵達西安後，就把他們的「並不在意外，而實在是意中」的主張——和平解決——傳達給他們的盟友。

十九日，蘇維埃政府與中共中央更進一步，聯名向全國人民及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發出通電，指出：「自西安事變之後，南京政府下令討伐……其發動內戰原屬失策，現顧全大勢，非抗日無以圖存，非團結無以抗日，堅持內戰，無異自促其亡。」因此，「當此危急存亡之秋……督促南京當局，立即召集和平會議，討論一切，奠定國是，團結反日。」

在周恩來與蔣委員長會見之後，委員長開始了解共產黨的新政策並不像他以前所了解的，他也開始明白妨害他的人不在西安而在南京！

加以端納、宋子文、蔣夫人的先後飛達西安，蔣委員長對京中情形更加明白了，陰謀家與日本是互相

勾結的——這正和共產黨觀察的一樣。於是他就決定接受西北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

在十七日——二十五日間，蔣委員長，張學良，楊虎城與共產黨代表舉行了許多次談話，他們同意這樣的協定——一、停止內戰與國共合作；規定武裝抵抗任何日本再度的侵略的政策；二、罷免某幾個南京的親日官僚，與採用積極外交政策，造成與英、美、蘇更密切的關係（如屬可能，與之結盟）；三、改組東北軍與西北軍，文台上，軍事上與中央軍同等待遇；四、予人民以更廣泛的政治自由；五、在南京建立一種民主政治機構。

再加以蔣氏以個人担保不再發生內戰，「和平解決」已到它開花的時期，廿五日在西北將領的同意下，張學良護送委員長返京了。

這二個星期的經歷使中國國內不再有戰爭了！

在全國人民普遍的反對內戰，蔣委員長的賢明正大，以及共產黨的忠誠爲國之下，西安事變是和平解決了！

西安事變是劃時代的歷史焦點。它一面結束了「無期徒刑」的剿共戰爭，一面却使中國歷史得以繼續，展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使一般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手牽手，肩並肩地團結在它的周圍。

九 「三中全會」——「安內」國策的結束

自蔣委員長返南京後，西北形勢又突趨險惡起來，原來是在日寇援助下，親日派把張學良扣留了；同時已奉令正在撤退中的中央軍，却在那些陰謀家的鼓動下，又向西安進攻，企圖配合日本在綏遠的戰事，以造成空前的大內戰，爲日寇效忠。

共產黨首先看清了日寇和親日派的陰謀，就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六日發出號召和平停止內戰的通告給國民政府，電文指出：「……當此危急關頭，本黨本政府站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之立場，堅決要求南京當局立刻下令停止軍事行動，肅清親日派，召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救國會，使國內和平立即實現。」又，「此時蔣先生應挺身而出，制止禍國禍民的內戰重新爆發。」因他在離西安時曾「……接受張楊二先生抗日主張，」「担保中國內戰之不再發生。」

但南京對這建議遲遲未執行，所以「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那「有背於現在中國人爲人的道德」的托匪，雖然在西安事變時他們的挑撥行動是失敗了，這次却把握着東北的憤恨情緒——張學良之被扣事。東北軍在這一剎那間却上了托匪的圈套，反對和平，甚至公開反對南京。

二月二日，托匪唆使暴徒打死主張和平統一團結抗日的王以哲將軍，幸楊（虎城）、于（學忠）兩將軍臨時應付辦法，才未釀成巨變。但同時，「在手段方面是無所不用，在政治方面則毫無原則」的托匪

的眞面目——日本的走狗與民族的罪人——經這次事變後，就完全暴動於全國同胞的面前；以後更證明他們的所作所爲，無一不是執行了托匪首腦的「絕對不去阻礙日本侵略中國」的指示。

於是國民黨不得不召集三中全會，來解決全國人民及西北所提出的，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問題。

二月十日中共中央發出具有歷史意義的電文給南京國民黨三中全會，在該電文內提出五項要求：「一、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全國人力，一致對外；二、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大會，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四、迅速完成對日抗戰一切準備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如果這些建議給大會採用了，那他們就予以四項保證——「一、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反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二、蘇維埃政府改爲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委員會之指導；三、在特區政府區域之內，實施普選的澈底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電文末尾並以最大誠意向三中全會宣稱：「國難日亟，時不我待，本黨爲國忠誠，可矢天日，請先生熱心爲國，定能允許本黨之請求，使全民族禦侮救亡之統一戰線從此實現也。我輩同爲黃帝子孫，同爲中華民族兒女，國難當前，唯有棄嫌合作，共同奔赴中華民族最後解放之偉大前程。」

這一電文的意義何在呢？在共產黨人認爲，「第一爲着便利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偉大事業，團結全中國的人民去戰勝日寇。第二爲着西安事變後已獲得了的國內和平，進一步的鞏固起來，給日寇漢奸挑撥中國內部的團結以致命的打擊；第三最重要的，爲着想盡一切力量，幫助國民黨三中全會通過符合

全國民意的決議，希望三中全會能够解決抗日救國及與之有密切關聯的國內和平與國內統一的問題。

這電文拍出後，不僅得到國內一切愛國分子的熱烈擁護，而且受到國民黨黨員及其一部份最有威望的領袖的誠意歡迎。所以不管三中全會在二月十五日——廿二日間，對這通電雖未公開加以注意，但會場提案却集中於救亡一點，尤以那恢復「先總理手訂的聯俄，容共，扶植農工農三大政策」的提案在會場上得到熱烈的討論與支持，辯論的結果還是通過了有利於國共合作的決議。

然而，儘管大會的宣言怎樣「自大」，不對自己的政策（已十年了）作一個澈底的批評，把一切「賬目」都算入共產黨那邊去；但它實際上却是和平條件的準備，大會在四個條件下給共產黨「以自新之路」——一，取消紅軍；二，取消蘇維埃政府；三，停止赤化宣傳；四，停止階級鬥爭。

再，大會雖然用投降的名義來代替合作，但國民黨最後却決定接受共產黨的主張，作為合作的談判根據。其實大會的所謂條件仍讓他們享有他們自主的國家，他們的軍隊，他們的政體，他們的黨以及他們未來最大限制的綱領。

大會最大的成就（一月六日已取消西安勦「匪」行營，八日却換上歐美派出任外長）——一，當前國內最重大的問題「是收復已失的領土」，這「據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是無形取消了；二，決定在十一月十二日召集久延的國民大會，迅速實現民主政治（這包括開放言論，已由蔣委員長在二月二十三日談話中表現出來了）。

好了，從一二九就開始的抗日救國時期第一階段的任務（爭取國內和平，消滅國內對立，以便團結一致，共同赴敵）與口號（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自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與國民黨三中全會後，是基本上完成了；此後，就轉入它的第二階段，這正如四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告全黨同志書」中所指出：「這個階段的任務，即是要鞏固已經取得的國內和平，爭取民主權利與實現對日抗戰。」這些任務的完成，需要全民族的總動員，需要我們全體同志為這些任務而鬥爭的最大的犧牲精神與堅決意志。……勝利只能是持久的艱苦工作的結果，而決不是它的開始，我們的前途是光明的，然而是一個持久的戰爭！」

三月，國共就開始談判。共產黨代表周恩來會數度僕僕於南京與奉化之間……商洽的結果，經濟封鎖解除，貿易機關成立在特區與特區以外各地；更重要的是內地交通已暗地恢復起來。所以在接壤的地方，紅旗與青白旗交叉起來，象徵着合作的光明。

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內，雖然國民黨對共產主義運動的限度是鬆弛了，政治犯（只限於少數不甚重要的）在不斷的釋放，但還採取「監視」「偵查」辦法，來防止共產黨的活動。

然而，無論如何，這確是一個大進步；這已足夠使那些不借任何代價反對國內和平的反動派大不高興，他們與蔣委員長和全國同胞恰恰站在相對立的位置，堅持着要消滅蘇維埃政府與紅軍，更重要的是，逼迫毛澤東與朱德出國……這些波折，幸由於雙方領袖的賢明，才未上他們的鬼計。

五月，共產黨在延安召集蘇區黨政軍代表大會，毛澤東在他的政治報告，「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目前階段的任務」上指出：

「爲了和平，民主與抗戰，爲了建立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曾在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電中向他們保證下列四項（見前面二月十日給三中全會的電文中——健）……這些保證，是必要的與許可的。因爲只有如此，才能在根據於民族矛盾與國內矛盾的變化而必須改變的國內兩個政權對立狀態的原則之下得着新的基礎，以便團結一致共同赴敵。這是一種有原則的有條件的讓步。拿這種讓步去兌換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與抗戰。然而讓步是有限度的。在蘇區與紅軍問題上共產黨領導的保持，在國共兩黨關係上共產黨獨立性與批評自由的保持，這就是讓步的限度。超過這種限制是不許可的。讓步是兩黨的讓步，國民黨拋棄內戰，獨裁與不抵抗政策；共產黨拋棄兩個政權對立的政策。我們以後者換得前者，重新合作爲禦侮救亡而奮鬥……」

「爲了建立民族統一戰線共同對敵，國內的矛盾，必給與適當的解決，其原則是有助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增強擴大，而不是削弱縮小。民主革命的階段內，國內階級間，黨派間……的矛盾與鬥爭是無法避免的，但可以而且應該停止其不利團結抗敵的部分，而保存其有利……的部分。」

「……中國資產階級，由於它經濟上政治上的軟弱性，在另一種歷史環境就要動搖變節，這一規律在中國歷史上已經證明了。因此，中國反帝與反封建制度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歷史已判定……必須經過無產階級的領導，才能達到目的。並且只有無產階級在民主主義革命中的堅持性與澈底性的充分發揚，才能克服資產階級的那種先天的動搖性，與不澈底性，而使革命不至於流產……今天說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及其任務的完成，離開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政治領導，就不能有所成就……因此……」

抗日救國的總參謀部的職務，共產黨是責無旁貸與義不容辭的。

「……關於民主共和國……其階級性是各階級聯盟，其前途是可能走向非資本主義……中國無產階級政黨是應該力爭這一前途的」

經過徹底的討論後，就在大會通過這有歷史意義的決議。
這國共合作，更踏前一步了！

一〇 第二次國共合作

一九三七年是中國新生的一年！

國共兩黨自三月以來就開始合作談判，到了六月已有美滿的收穫，七月四日共產黨就起草爲宣佈兩黨合作的宣言。另外約定蔣介石準備發表承認中國共產黨合法地位的談話。

由於中國的漸趨統一團結，由於國際經濟恐慌的新爆發（連日本也在內），由於英國的「現實主義」的深化（是以犧牲弱小國家，促使德日進攻蘇聯的政策），所以日本就在七月七日午夜砲轟宛平城，以分化威脅我國的團結，但結果却把中國推進了一個新時代！

八日共產黨發表了號召全國民衆抗戰宣言：「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我們要求立刻給進攻的日軍以堅決的反攻，並立刻準備新的大事變！全國上下應該放棄任何與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與估計……」末尾，更大聲疾呼：「全中國同胞，政治與軍隊團結起來，建築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國共兩黨親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進攻！」

十七日，蔣委員長也發表號召抗戰的談話：「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的生存。那時節，再不容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此皆全國國民最認清的所謂最後關頭的意義。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只有犧牲到

底的決心，才能博得最後勝利，若是徘徊不定，妄想苟安，便會陷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從這次事變的經過，知道人家處心積慮的謀我之亟，和平已非輕易可以求得……如果蘆溝橋可以讓人壓迫強佔……那末北平，就要變成瀋陽第二……北平若果變成瀋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所以蘆溝橋事變的推演，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政府對於蘆溝橋事變，已確定始終一貫的方針和立場（一）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三）中央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退；（四）第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約束。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只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倖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

這兩個真有絕對歷史意義的政治宣言的共同點是：主張堅決抗戰，反對妥協退讓。

這，中共就在七月十五日宣佈取消蘇維埃政府，改為陝甘寧邊區政府；調整紅軍，在候着抗日的動員令；同時，等到邊區的民主選舉（在中國是第一次的創舉，一直到十月才完成。）

但過去蘇維埃口號是否錯了？這，我們只能根據共產黨人的解釋：「資產階級叛變後，各階級的關係變了，革命的力量也就變了……爲了保持革命的能力，使革命繼續而不中斷，我們單獨扭負了中國革命的任務，以工農小資產階級聯盟澈底進行土地革命，組織蘇維埃政治，去反對帝國主義軍閥資本家和豪紳地主來完成資產階級的革命。」但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在日本帝國主義無饜足的侵略之下，使中國的階級關係變化了，民族矛盾超過了階級的矛盾，各階級爲了自己的利益和生存，於是不能不改變它的政策。黨這時爲了達到新任務的完成，就發表八一宣言要求全國各黨派，建立統一戰線以達到建立新

的民主共和國」是爲「利於中國革命的轉向前進。」「中國土地屬於日本帝國主義，還是屬於中國人，這是首先待解決的問題。在保衛中國的大前提之下來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由暴動沒收方法過渡到新的適當方法上去是必然的。」「中國共產黨十年來，沒有一天違反過爲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的爲解放而奮鬥的目標。過去大革命時，同國民黨合作是如此，在大革命後爲蘇維埃中國而奮鬥也是如此，今天爲民主共和國而奮鬥，仍然是如此！」所以，「蘇維埃口號，過去的提出與今天的放棄，都是正確的。」了。

由於蘆溝橋事變的演進，部份人還幻想和平。中共於二十三日發表第二次宣言，反對冀察當局的「地方解決」企圖，堅決主張「立刻實行全中國人民總動員。」「立即實行全面的對日抗戰。」「反對一切對於日寇的讓步妥協，堅決抗戰到底！」

二十九日，蔣委員長再度發表談話，切實聲明：「政府有保衛領土主權與人民之責，唯有發動整個之計劃領導全國一致奮鬥，爲捍衛國家而犧牲到底，此後絕無局部解決之可能！」

但由於冀察當局與一部份人的猶豫，二十八日平津不戰而陷落了，這更引起全國同胞的憤恨；「只有抵抗，才能挽救中國的危亡！」這是中國人一致的呼號。不過，日寇還想藉虹橋（八月九日）事件，以逼迫南京政府就範；那知這星星之火，竟爆發爲八一三上海抗戰的火炬！

國民政府於十四日發表宣言，於是全面抗戰就開始了——很顯明的，這戰爭一定是中華民族的解放與全人類正義的實現的一致。雖然自三中全會以來爭取民主的任務，由於南京當局之不願開放，沒有能夠得到很好的成就，但只得在抗戰過程中加以實現了。

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就發出爲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的有名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二，全國軍事的總動員；三，全國人民的總動員；四，改革政治機構；五，抗日的外交政策；六，戰時的財政經濟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肅清漢奸，賣國賊，親日派，鞏固後方；十，抗日的民族團結。同時在「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上清楚的指出：「……七月七日蘆溝橋的抗戰，已經成了中國全國性抗戰的起點。中國政治形勢從此開始了一個新的階段，這就是實行抗戰的階段……在這一新階段內的最中心的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的勝利……今天爭取抗戰勝利的中心關鍵，是在使已經發動的抗戰發展爲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只有這種全面的民族的抗戰，才能使抗戰得到最後的勝利。本黨今天提出比的抗日救國的十大綱領，即是爭取抗戰最後勝利的具體的道路……由於當前的抗戰還存在着嚴重弱點，所以在今後抗戰過程中，可能發生許多挫折，退却，內部的分化叛變，暫時與局部的妥協等不利的情況……因此應該看到：這一抗戰是艱苦的持久戰，但我們相信已經爆發的抗戰必將因爲我黨與全國人民的努力，冲破一切阻礙，而繼續的前進與發展……不放鬆一刻工夫一個機會去宣傳羣衆，組織羣衆，武裝羣衆，只要真能組織千百萬羣衆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日戰爭的勝利是無疑的。」

雖然八月二十二日國民政府特委派朱德、彭德懷爲八路軍總副司令，二十三日朱德、彭德懷發表就職通電，紅軍正式改爲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但那時候，親日派，反動派還十分頑強，多方阻撓與破壞國共合作。可是由於戰事緊張，共產黨的宣言與蔣委員長的談話就由中央社於九月二十二、二十三兩天先後

發表了。

中共的宣言，不但宣佈堅決履行二月十日所提供的四項保證，還規定了爲新中國而奮鬥之總的目標：『爭取中華民族之獨立自由與解放，首先須切實的迅速的準備與發動民族革命抗戰，以收復失地恢復領土主權之完竣；二，實現民主政治，召開國民大會，以制定憲法與規定救國方針；三，實現中國人民之幸福與愉快的生活，首先切實救濟災荒，安定民生，發展國防經濟，解除人民苦痛，與改善人民生活。這不獨將爲兩黨團結的方針，而且將成爲全國人民大團結的根本方針。』

蔣委員長的話，承認了共產黨在全國的合法地位，并指出『余以吾人革命信譽者，不在個人之意氣與私見，而在三民主義之實現。在此存亡危急之秋，更不應計較過去之一切，而當使全國國民澈底開始力謀團結，以共保國家之生命與生存……對於國內任何派別，祇要誠意救國，願在國民革命抗戰禦侮之旗幟下，共同奮鬥者，政府無不開誠接納……』這是很好的，但還沒有拋棄國民黨那種自大精神，還沒有能坦白地承認它過去十年來在民族危機中自己所應負的責任，這未免有點美中不足！

但，國共合作是成立了，今后的問題是怎樣去鞏固與擴大環繞於這一團結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一一 抗戰第一階段

七七，揭開了抗戰的序幕；八一三，展開了全面性的抗戰。跟着國共合作成立了。

第二次合作的第一個表示是第八路軍（紅軍）九月廿五日在平型關的大捷，這給全國同胞一個大刺激，各友軍一個大鼓勵。

但，那時候，很可惜的，我們在外交上還徘徊於兩個陣線之間（雖然那年八月二十九日與蘇聯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但還沒更進一步……）；在軍事上老是採守勢，而且各軍的指揮還不統一，軍隊與民衆深深的隔離着，在政治上還是「統制」，「鎮壓」，讓那些腐化分子盤據要津；更重要的，不但不改善民生，開放民運，反到處包而不辦。施以種種壓迫……

那時特別是首都南京的失守，中國確在滿城風雨的狀態之下。很巧合地，同在十二月二十五日，蔣委員長談話指出：「外敵不足慮。只要內部團結。」要「寄於廣大強固之民心。」與「再接再勵，愈挫愈奮，則障礙摧毀之日，即最後勝利之時。」同時中共對時局宣言提出：「挽救時局的中心關鍵，」是「我民族抗戰更加團結。」——鞏固和擴大民族統一戰線，以鞏固國共兩黨之精誠團結爲其中心環節，來澈底抗戰到底，爭取最後勝利；并鄭重聲明「共產黨不僅誠意在抗戰階段中與國民黨并肩攜手地共同救國，而且決心在抗戰後與國民黨和衷共濟地共同建國。」它更進一步建議六項工作——動員全中國武力，人力，智

力、財力、物力，繼續守土衛國的長期抗戰，鞏固和擴大全中國的統一的國民革命軍，充實和加強全中國統一的國民政府實行國防經濟政策，建立鞏固後方，動員組織廣大民衆，協助軍隊和政府積極抗戰，擴大國際宣傳和增加國際援助——作爲戰勝日寇的保證。

這樣，由於國共兩黨及全國大衆的堅決，排除了主和派的主張，拒絕了日本「防共盟友」德國的調停建議，更加打走了漢奸敵探托匪加緊挑撥離間以破壞我國民族力量團結底陰謀，而開始作政治的外交的，軍事的改革，於是抗戰又好轉起來了。

一九三八年二月由於歷史與種種原因，兩黨間竟發生不必要的磨擦，國民黨內的某些派別不能遵守「抗日高於一切，」——「一切爲了抗日」的原則，妒忌共產黨深得大衆信仰，就抨擊什麼邊區破壞統一，什麼第八路軍游而不擊，什麼共產黨培植反三民主義宣傳……就主張清共，實行一黨專政。關於邊區，毛澤東對世界學聯代表團（一九三八年七月二日）指出：「一句話說完，是一個民主的抗日根據地……在民衆方面，都有他們自己的組織……邊區已成了直接抗戰的區域……教育同樣是抗日的與民主的……經濟方面也是這樣，以有利抗戰爲主旨，而以民主精神經營之……邊區各級政府都是由人民投票選舉的……」所以全國應拿它作榜樣。其它無理取鬧部分，我們只要引用三月蔣委員長所決定採用的三項原則——關於軍事，應以第八路軍爲模範，採用他們的戰術；關於政治，則計劃改造政府及調整國民黨；關於民衆組織，則決定加強各民衆團結的組織，如何改善民生救濟難民，調整勞資關係，撫卹戰士遺族……——就足夠打腫他們的嘴吧了。

同時，豫抗日救國這樣的大事情決非任何一黨所能包辦的，應該由各黨各派的合作，以達到「共同負責，共同領導」的目標。因此共產黨向國民黨臨全大會建議：「……只許一黨合法存在，同時不承認它黨派并存的辦法，既爲事實所不許，取消現存一切黨派而合併爲一黨組織的辦法，亦爲事實所不能；解決此問題唯一正確的辦法，在於遵照孫中山先生的精神，建立一種包括各黨派共同參加的某種形式的民族革命聯盟，即由各黨派，各團體擬定一個統一戰線綱領，作爲各方宣傳行動共同遵守的方針；同時，由各方代表組成一個由上而下（即中央與地方）的統一戰線組織，以規劃抗日救國的大計，調整各黨派各團體的關係；而參加民族革命聯盟之各黨派仍保持政治上，組織上之獨立。」跟着，更建議健全民意機關與動員和組織民衆二大問題，望能列入臨全大會提案，作爲研究和討論的參攷，最後指出：「敝黨擬派代表團列席貴黨臨全大會，同時，并預請貴黨選派代表團將來出席敝黨七全大會，以示兩黨同志般友愛與團結。」（三月一日）

三月廿九日國民黨臨全大會在漢口召集，共產黨也派代表團列席。經三日的討論，就產生三十二條有名的抗戰建國綱領，這可以說與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同爲全國同胞的共同綱領。在宣言上對革命的三民主義下明確的詮釋（是一九二七年以來的第一次），并規定設立國民黨參政會……這確是大會的收穫。

但我們認爲大會最足遺憾的是——我們完全同意蔣委員長當選爲總裁，因爲這樣不獨控制與調整複雜的國民黨，還能根除黨內的小組織；不過却還讓「和平」派如汪精衛之流以活動地位。二對於

外交方針，還沒有明確的表示。這是中國跟着張伯倫路線跑的緣故；三，對各黨派合作得不够，因此對民運是包辦的而不是讓民衆自由組織的……；四，國民參政會不過是一個政府的諮詢機關，同時選舉法也不民主（由每省指定四人，再由政府圈定二人）；其實代表應由人民真正選出，并應賦大會予強大權力，使由諮詢的而轉到對國策有最後決定權的機關；五，對東北義勇軍根本沒提起。

然而，臨全大會却表示國民黨一大進步，全國大衆應督促它，要求它對抗戰建國綱領的澈底兌現，來使它往前踏進。

大會閉幕不久，國家社會黨，中國青年黨……也先後加入統一戰線，取得合法地位，共同爲捍衛祖國而奮鬥；這以國共合作爲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往前發展了。

四月，中共清算了左傾機會主義的張國燾，正同八七會議清算右傾機會主義的陳獨秀，同樣地鞏固與保衛了本身的團結與組織，使它對革命更能發揮它偉大的作用。中共這及時而斬釘般的措置，同時也暗示了它的盟友國民黨對它的組織的調整更有首要的意義，這後來就開除了投降路線的汪精衛。

不久，雖然表示着抗戰已從軍事的轉向政治的動員底開始——台兒莊大捷；但五月徐州放棄了，當時就有亡國論與速戰論的兩種極端傾向，如果讓它倆發展下去，對抗戰都會一樣地不利的。

所以五一六日毛澤東在『論持久戰』的演講中給它倆以無情的批駁，并指出：

『……依據全部敵我對比的基本因素，』『敵人是帝國主義的強國，我們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國，』然而，『強弱對比雖然規定日本能够在中國有一定時期與一定程度的橫行，中國不可避免的要走

一段艱苦的歷程，抗日戰爭是持久戰而不是速決戰，然而小國，退步寡助與大國，進步，多助這三個相反的對比，又規定了日本不能橫行到底，必然遭到最後的失敗，中國決不會亡，必然要爭最後的勝利，「戰勝日本帝國主義要有三個條件，中國的進步（主要的，基本的），日本的困難與國際的援助。這我們就要努力加強優點，克服缺點……持久戰是這樣決定了。」

「中日戰線的持久戰，將具體表現於三個階段之中」（第一階段是敵進攻，我防禦——在戰略上運動戰是主要，游擊戰與陣地戰是輔助的；第二階段是敵保守，我準備反攻——在戰略上游擊戰將升到主要地位，而以運動戰與陣地戰輔助之；第三階段是我反攻，敵退却——那時我們在戰略上運動戰再升為主要形式而輔助之以陣地戰與游擊戰，但這時的運動戰已不全是原來的正規軍負擔，將由游擊戰提高到運動戰先擔負其一部份，也許其相當重要的一部份。）「中國將變為獨立，還是淪為殖民」是「決定於第二階段中全民族努力的程度」

「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於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只有這樣，才達到「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的目的。

蔣委員長在七七抗戰週年紀念日告全國軍民書中也指出：「我們抗戰目的為保障土地和主權的完整。我們最後目標，為重建東亞和平，我們決繼續抗戰，雖只剩一人，亦將抗戰到底，無論如何，此乃最大決心……我們必須發揚精誠做到鋼鐵一般堅固的團結……完全以「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為前提，以「軍事第一」「勝利第一」為目標，胸次廓然，除開國家民族利益而外，不夾絲毫的渣滓。我們……當

前的命運只有一個：不奮鬥即滅亡，能團結即有前途……」這「於抗戰前途是異常重要的。」因此「我們要絕對一致，永遠一致！」

由於兩黨領袖對抗戰的至誠指示，在中國歷史上的創造的國民參政會就表示這一趨向：向着勝利之路邁進！

大會的收穫在：確定了「抗戰到底爭取國家民族最後勝利」的國策；宣布了「各黨各派各界合作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確定了「實行民主政治」的方針；說明了「在抗戰時期保障民生」的必要；決定了「抗戰建國綱領」為實施抗建的共同遵守圭臬。

其實更重要的却是需要我們長期的、不斷的努力和堅持的奮鬥，因往後是諾言的兌現時期。

兩個月後，由於國際情勢起了變化，西方的慕尼黑會議可能的來個東方的翻版，所以「日本代言人」汪精衛又活躍起來，發表什麼「如日本提出議和條件，不妨害中國國家的生存，吾人可接受之……吾人未嘗關閉調停之門……」的諸如此類的所謂談話後，日本就利用這個「裏應外合」放胆陳兵廣州，結果廣州武漢不守放棄了，而日本呢，却還像攻下南京時等候和議「回音」般的來翹望着汪的「改變」成功。此後，日本自知在軍事的進攻上，雖然還有點餘威；但武力却不能使中國屈膝的，所以把政治進攻與經濟引誘，提升到第一位，一方面開始強化與鞏固其佔領地的統治，實行「以戰養戰」政策，他方面繼續離間，勾結親日派反共派妥協派以求從內部瓦解抗戰營壘的陰謀，這就是「以華制華」政策……到現在還這樣繼續，更翻的執行着。

跟着第二次國參會。由於共產黨參議員本着「堅定的政治立場和誠摯的團結精神」的工作方向，擁護抗戰團結和揭露親日派主和陰謀的工作，就全體一致擁護抗戰到底的國策，使汪的「東方弗朗哥」之夢落了個空。

在這個轉變的階段中，推動這個轉變的是兩個會議——延安會議與南岳會議。

蔣委員長在告全國國民書（十月卅一日）中指出：「……抗戰軍事勝負之關鍵不在武漢一地之得失，而在保持我繼續抗戰持久之力量，『克敵致勝之必要因素』為『持久抗戰，全面戰爭，爭取主動』。所以『此次抗戰非一年半載可了，必經非常之困苦與艱難始可獲得最後之勝利。』跟着在南岳會議上對今後的整個戰略，宣示了六大原則——一、政治重於軍事；二、游擊戰重於陣地戰；三、人民重於士兵；四、宣傳重於作戰；五、精神重於物質；六、節約重於生產。

毛澤東在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的報告（十月十二——十四日）「論新階段」上指出：

新的困難可以在進步的過程中克服，由於中共力量的擴大與信心的抬高，由於國民黨的必然進步，……由於全國民衆的渴望與推動，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要繼續向前發展的……

由於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特性——全民抗日的，長期性的，不平衡的，有軍隊的，有十五年經驗的，大多數民衆尚無組織的，三民主義的，處在新的國際環境中的——所以國共兩黨長期合作的根據在戰爭的長期性，決定了合作的長期性，戰爭中的合作，決定戰爭後的合作，這樣來先完成新民主主義。長期

合作的組織形式，毛提出：由國民黨本身變為民族聯盟或各黨共同組織民族聯盟或現在沒有成文，不要固定，從事協商的辦法……

因為中國與世界不可分離，所以中華民族解放運動與外援的配合，以自力更生為主，同時不放鬆爭取外援的方針。廣大人民反法西斯運動之將來的配合，以自力更生為主，同時不放鬆爭取外援的方針。

這樣說來，全中華民族的基本任務應該是堅持抗戰，堅持持久戰，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克服困難，增加力量，停止敵之進攻，實行我之反攻，以取得最後驅逐日寇出境和建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的光榮。

最後，毛氏號召共產黨員應根據上述的基本任務，在民族戰爭中的各方面起其先鋒的模範的作用，從團結全黨到團結全民族。

這報告不只是中共的重要文獻，而且是清楚地分析當前局勢和指示出抗日民族革命鬥爭的途徑。一句話，兩個會議的總結在堅持抗戰到底，力求以我國的政治進步去打擊和粉碎日本的政治進攻。此後，中國抗戰就向新的階段移行。

我們早就說過，日本懼怕的是我們的團結，所以又玩弄了它那拿手的好戲——分化政策，這在國內，汪拉在攏軍閥政客，醞釀「政變」，同時與汪同一鼻孔出氣的玄學鬼們却向中共大施攻擊，什麼「兩個軍隊」，「兩個政府」……培養勢力，破壞「統一」；跟着十二月二十二日敵相近衛發出誘和談話。根據「善隣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原則，「共同向東亞之新建設邁進。」

3. 4. 91
Charles
of and sons
of Paul Jones

但中國的反應呢？二十六日蔣委員長的談話鄭重聲明：

○所謂「善隣友好」就是「日滿支三國」，建立「東亞新秩序」，推反東亞的國際秩序，造成奴隸的中國，以遂其獨霸太平洋，宰割世界的企圖的總名稱。

○所謂「共同防共」，不過是要以共同防共的名義，首先控制我們的軍事，進而控制文化，以至於外交……借此名義以亡華。真的，在我們全國一致實行三民主義的中國，若再談共同防共，完全是無的放矢。

○所謂「經濟提攜」，就是「經濟集團」，這不僅是要操縱我中國關稅金融，壟斷我全國生產和貿易，獨佔東亞的霸權，逐漸推演下去，勢必至於限制我們中國個個人民的衣食住行，都得不到一些自由，生殺予奪，唯其所欲，整個的中國民族做奴隸，做牛馬，在鞭笞之下，整個消滅我們民族的生存。

這篇有歷史意義的訓詞，不僅揭穿了日寇亡我國家滅我種族的毒計，并且益加提高了全國人民堅決擁護抗戰到底的這一國策的熱情，同時更正告世界諸友邦，中國抗日戰爭，決無中途妥協之理，最後，也就預先把汪逆顛電宣佈了死刑。

一九三九年元旦國民黨中央就永久開除汪逆的黨籍。這提高了黨的革命精神和黨的紀律，更會形成黨的統一和力量的集中，對抗戰建國運動的前途是完全有利的。不過，雖然革除了汪逆的黨籍，却還希望它自新來歸，清算了公開的汪精衛，却仍讓暗藏的汪精衛無限活動……這不獨不智，而且也不可思議的。與共產黨清算了張國燾，使黨得到空前團結，却不可同日語了。這不獨是國民黨的損失，也是國家的損失，所以後來無限度的磨擦事件，追根思源，與這次不澈底的清算不無關係的。

二月，國民黨五中全會成功地召開了，雖然沒有討論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所指出長期合作的組織形式底意見，但希望「全國同胞……凡願實行三民主義而參加本黨，從事國民革命抗戰建國之神聖事業者，無不誠摯歡迎。」這誠懇的態度是很可採的，不過似還有「一個政黨」之嫌。

最後，又在會場上，有些人竟主張限共反共，但蔣委員長却認爲「對於共產黨，我們應以誠心，互相感召，這樣使頑固分子的喊聲萬聲俱息了。在宣言中慎重指出：自今以後，吾人之責任益加艱難。欲擊破暴敵最後掙扎之猛烈侵略，更須竭盡吾全國國民所有之心力物，共同致力於加強團結，積極奮鬥與努力建設之事。而提高民族精神與整飭革命紀律更爲上述三事成功之保障。」這，與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在基本精神上是已奠下了克服困難渡過難關的初步基礎了。

大會更進一步，「吾人檢討過去一切工作，實猶未盡努力，所努力者，未盡確實，未盡協調，亦未能言行一致，始終一貫，貢獻其全力以適應戰爭之要求。」因此，決定：一，設置國防最高會議；二，改進縣以下黨政機關；——這些，如果切實履行，對抗戰是很有幫助的。

國民黨爲了提高民族精神與整飭革命紀律起來，三月就頒佈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不過精神動員是全國總動員之一部分，它必須以全民動員，物質動員，人力動員爲基礎，因此，必需要以發揮組織的力量爲目的。

就共同目標來說——「民族至上，國家至上」就是高度的發揮民族精神，高度發揮愛國精神；「軍事第一，勝利第一」就是要一切爲着前線，一切爲勝利；「意識集中，力量集中」就是集中一切意志，動員

一切力量，以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

就內容來說——概括的是對堅持抗戰的決心，對抗戰勝利的信心，對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對政治的改進，對民運的發展與對戰時生活的建立。

它確是此時此地對症下藥，中共在爲開展精神總動員告全黨同志書中指出：「精神總動員即是政治動員，它不依靠於強迫命令，而依靠於人民之政治的自覺……只有經過民主方式，注意宣傳鼓勵，才能推動全國人民，造成壓倒敵人，刷新自己的新潮，」但事實呢，由於頑固分子的懼怕民衆，致使成爲虎頭蛇尾，官樣文章，而毫無生氣，這未免太可惜了。

到了八月，抗戰第一階段大致完結了。

這時期雖然投降妥協是主要的逆流，但在七七，蔣委員長說：「這些漢奸所謂和平運動，實在是亡國的運動。」我們今天對敵人只有勝利，只有達到我們抗戰的目的，除此以外，亦沒有第二條可走的道路。」我們更要鞏固統一，加強團結，發揚敵愾心，提高自信心！」「凡是於敵僞有利的，都是於我們有大害，因此，凡是敵人要求我作的，我們絕不要作……凡是敵人說壞的，一定是好的。對於敵人的一切言行，都要從反面去觀察，去懲付，去毀滅！」這不是足夠給予高喊「防共」「反共」的人們一個嚴厲的迎頭痛擊嗎？

中共的「紀念抗戰兩週年對時局宣言」則更明顯的指出了目前時局危機癥結的所在。宣言中說：「……日寇政治誘降的惡毒陰謀……中國投降妥協份子投降與分裂的罪惡活動……國際東方慕尼黑

黑的暗中醞釀，三者匯合，便造成今天抗戰形勢中的最危險，即中途妥協與內部分裂的危險。這就是今日政治形勢中的重要特點，可能的趨向。『我們要堅持抗戰到底，反對中途妥協鞏固國共團結；反對內部分裂；力求全國進步，反對向後倒退。我們要繼續抗戰，抗戰到把日寇驅逐到鴨綠江邊的對岸；我們要鞏固團結，團結得像鋼鐵一般的強固；我們要向前進步，進步到三民主義新中國的建立。我們要反對妥協投降份子罪惡活動，我們要反對國際反動派的東方慕尼黑陰謀。』——這就是全國人民最重要的任務，要在下一個階段——相持階段——趕快完成的。

真的，國共兩黨在此時此地懇切聲明團結抗戰，確把時局澄清起來了。
這一階段，中國的進步在短短的二年却遠遠的超過以前廿來個年頭。

在政治上，全國統一團結，成爲抗戰建國的勝利重心，同時國共兩黨先後頒佈了使抗戰有依循的綱領。跟着清算了許多民族敗類……但殊爲遺憾的是讓反共份子，妥協份子的猖獗，致使二月以來國共磨擦的加劇。人民自由的權利格於執行機關，不但決而不行，反到處保甲殃民，貪污腐化，查封書報，禁止開會與活動，解散愛國團體……

在外交上，大體上還能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爭取外援，以社會主義的蘇聯幫助得切實而多，單就不要息，不要保的借款已達四十萬萬元了……

在軍事上，統一的指揮，戰略的靈活，軍火的豐藏，新軍的訓練……確有很大的進步，但特別八路軍在華北，新四軍在江南更能與人民打成一片，恢復，建立許多地方政權。不過兵役，傷兵醫藥，優待軍人家屬，撫

卹傷亡將士等問題却大都辦理不善。

在經濟上，雖然還有人利用黑市匯價去發其國難財，壓迫剝削工農與借公營私去滿足其貪污之欲，但大體上對外能統制外匯，統制對外貿易，對內鞏固法幣信用，設立中小兵工廠，遍設工業合作社來準備自給自足的戰時經濟。

在羣衆（民運）上，發展是不平衡的，這和領導者的政策有關的。許多地區，說來痛心，「統制」、「包辦」、「鎮壓」、「排斥」的現象到處都是。

不過一般說來，撇開某些不能令人滿意的現象，抗戰第一階段的成就却對第二階段有很大的幫助，是人民進步了，了解他們的出路要在抗戰勝利後，所以拚全力支持與鞏固抗戰，使抗戰不致中途妥協，無論如何要勝利一定能勝利！

但日本呢，却和我國相反，向下猛降，二年「聖戰」已使它有生力量的消耗（死傷百萬，幾至無兵可調），戰鬥力的削弱，財政經濟的困難（戰費消耗了九十萬萬，國債已達二百萬萬，而它國民收入整個一年只有二百六十萬萬呢！）與國內階級矛盾的加激（甚至支持「聖戰」最力的中小階層也自怨自艾起來了）——這樣使日寇深陷泥淖，不但不可自拔，且快滅身了。

總之，日寇沒有前途（假如硬說有的話，就是滅亡），而中國却有前途——新中國的光明事實已這樣有力的說明了。

一一一 抗戰第二階段

八月，蘇聯看到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的將要到來，爲避免被牽入漩渦與更便於推行與全人類利益一致的和平政策，就適時地與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打擊了張伯倫的（「嫁禍」蘇聯底）「靖綏」政策，國際形勢就形成了；在中國，由於人民大眾爲了個人自由，民族解放與國家生存，就拚全力堅持抗戰，使它絕不妥協；在日本，由於我國的堅決，國內的矛盾與國際的孤立，就加重它的新困難——這，中國，日本與國際三方面的匯合，自去年九月起，我國的戰略退却階段便已完結，而第二階段有條件的到來了。

那麼，抗戰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有怎的不同特徵呢？

「（A）在日本方面——對我後方過去……以軍事進攻爲主，以政治進攻爲副；現在……以政治進攻爲主，而以軍事進攻爲副了。同時，因過去以正面進攻我後方爲主，對敵後方以確保佔領地的「點線」，建立許多獨立的偽政權，到處燒殺奸淫以威嚇人民爲主；現在因對後方以政治進攻爲主，故對敵後方則以軍事「掃蕩」，擴張「面」的佔領，實行「以戰養戰」的經濟政策，奴化教育與懷柔政策，建立所謂統一的偽中央政府爲主了。自歐戰爆發以來，敵人雖企圖利用機會，加強對我後方某些地區的戰役進攻，但……仍然是爲了達到逼我投降的政治進攻的目的。

（B）在國際方面——過去帝國主義國家中的所謂「民主國」首先是英、美、法，爲了保持它們在

華的利益，以扶助中國抗戰爲主，同日本求得妥協爲副；現在……爲了保持它們同樣帝國主義的目的，以犧牲中國同日本求得妥協爲主，而以多少支持中國抗戰爲副了。特別自歐戰爆發後，這些國家正在努力進行停止中國抗戰瓜分中國的陰謀。只有社會主義的蘇聯，始終站在援助被壓迫民族的基本立場上，繼續援助中國，而且還增加着這種援助。

(C) 在中國方面——現在由於敵人沒正面的大規模的戰略進攻，而只有躍進式的戰役進攻，所以正規軍的正面的大規模的作戰，一般的比較沉寂，某些地區某些正規軍的作戰與進退，在全國並不能起像過去一樣的決定的作用。國內堅持抗戰，團結，進步的全國大多數人民的政治路線，正在同舊中國的一部份擁護者所主張的投降，分裂，倒退的政治路線，展開着全國性的鬥爭。在敵後方，正在反對敵人「掃蕩」的廣泛的游擊戰爭。兩條政治路線間的政治鬥爭，在敵後方也緊張起來了……過去……以軍事抗戰爲主，政治抗戰爲副；現在……以政治抗戰爲主，軍事抗戰爲副了。在軍事抗戰方面，過去以正面的正規戰爲主，敵後的游擊戰爲副；現在，則以敵後方的游擊戰爲主，正面的正規戰爲副了。在游擊戰方面，過去以進攻敵人所佔領的點線，摧毀敵人的偽政權，擴大與建立抗日根據地爲主；現在，則以保衛抗日根據地，粉碎敵人的「掃蕩」，破壞敵人的「以戰養戰」的經濟陰謀爲主了。」(相持階段的形勢與任務(下) 第二一三頁)

這樣說來，改革國內的政治是非常重要的，因爲「中國將變爲獨立國，還是淪爲殖民地」是「決定於第二階段中全民族努力的程度」這就是說民主政治問題的加快解決，對準備反攻有首要的決定的意

義的。

這，九月召開的第四次國民參政會一致通過與蔣委員長答應「交政府切實施行」的「召集國民大會實行憲政」案，不就是表現這一新轉變嗎？

決議原文：（甲）治本辦法：（一）請政府明令定期召開國民大會，製定憲法，實行憲政。（二）由議長指定參政員若干，組織國民參政會，憲政期成會，協助政府，促成憲政。（乙）治標辦法：（一）請政府明令宣傳全國人民除漢奸外，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二）為適應戰時需要，政府機構應更充實並改進，藉以集中全國各方人才，從事抗戰建國工作，爭取最後勝利。

這一政治決議有兩大意義的，一在對抗與揭露敵寇汪逆正在進行的政治欺騙與陰謀，一是反映出全國人民的公意——是中國政治走上民主道路的新紀元的開始。

但另一方面，汪逆八月於上海召集的「六全大會」成立偽「國民黨」中央，號召什麼「反共和平建國」，這，暗藏的汗精衛與大資產階級就明的暗的唱對台戲，與日本誘降和國際陰謀配合起來，所以目前投降現象與倒退現象仍是資產階級動搖份子準備投降的步驟。因此為了達到避免亡國危險，準備反攻實力之目的就要：「在我後方必須迅速的認識的肅清投降份子，打擊反共現象，停止倒退現象，實行行政改革，結束一黨專政，召集真正代表民意的有權力的國民大會，製定憲法，實行憲政。」這確是對症下藥，催促國民大會早日召開中共雙十節決定在最後一段更號召全黨「提高對當前時局的警覺性，用全力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鞏固我們的黨，鞏固黨所領導的抗日軍隊與抗日政權，以便準備對付可能的危

害民族抗戰的突然事變，而使黨與中國民族抗戰在可能的突然事變中，不致遭受意外的損失——中共這一措置，爲黨，爲國家民族，爲全人類，都是很必需的，何況它對中國革命肩負雙重任務呢！

由於這一危機的滋蔓，國民黨於湖北，粵北的勝利不久就召集了六中全會。突然戰場上的武裝衝突在會場上有了公開的反映，是很少的幾個黨內元老起來主張發表排斥共產黨的宣言，但他們却全給委員長駁掉兼呵斥了。所以大會再一次重申了國民黨拒絕加入防共協定。於是頑固派暫時沉默下去。此外，大會在「今日唯一之責任，即爲於抗戰緊張之中，急起直追，以完成建國事業之一切準備」下定於一九四〇年冬，召開國民大會（與加緊促成縣政建設），這，跟着就展開全國對憲政熱烈的討論。

我們知道，憲草決定的時後，是「安內」時期，只有一黨合法，人民沒權利。現在是抗戰階段，各黨合作，人民大進步了。所以那時的人選與憲草決不能適用於三年後的今天；同樣，那時是爲了便於一黨「專政」，現在却是爲了加強抗戰力量，國民大會應爲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是必然的了。

這，延安各界憲政促進會一月二十日指出：「今日實施憲政之意義，在於發揚民意澈底戰勝日本帝國主義；二，國民大會選舉法必須澈底修正；代表必須賴于選舉；三，「國民大會組織法」必須澈底修正；四，全國應發起普遍深入之憲政運動——這確是全國人民所一致希望的與主張的。」

但二月十一日國民黨的憲運指示竟大異其趣，認爲「五五憲草是合法的，」以前所「選出的代表是當然的，國民大會只能是一純爲一制憲機關，」更甚焉者，憲政討論只能由黨部「控制」和「限制」……跟着，各地人民的憲運給禁止了，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給箝制了，「灰色分子，」「別有用心」的帽

子就送給真誠爲國的人們了……

雖有四月五屆國參會對憲政問題熱烈討論，但「惟因時間關係，還沒有得到圓滿的結論」，就將雙方意見併送政府。這，頑固分子企圖使行將召開的國民大會，把民主立憲推至於不可知的將來與延長一黨專政的美夢似實現了；但，這是滅削了準備反攻的力量，人民大眾將要不避困難，曲折，使大會有必要

的成就，以至更進而實現民主政治，加速抗戰建國大業的完成——這是可預卜的。

這些高壓氣氛確使一九四〇年的中國臨到它的「黃梅時節」。

由於一月「汪日祕密協定」的公佈，激起了海內外同胞極端的憤恨。真的，「如果我們不堅決抗戰，使敵閥消滅，不但中國國家和民族的皮骨無存，將來太平洋有關的各友邦也將要陷於不可僥免的命運」（蔣委員長告全國軍民書），所以「擺在中國人民面前只有兩條道路：一條就是堅持抗戰的道路，中國人民所走的道路，中華民族的生路；一條就是對日投降的道路，漢奸汪精衛及其它投降分子所走的道路，中華民族的死路，中間的道路是沒有的而且也不可能有的」（一月廿三日新華日報社論：全國同胞起來反對汪派賣國密約）。

三月卅日，偽「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統一了全國的傀儡政權，國民政府就照會各國，宣佈偽組織的行爲完全無效。但我們必須統一於抗戰，統一於團結，統一於進步，這樣地給汪派及其牽線人——日寇——雙鐵拳的答復，所以全國大眾憤慨激昂，反汪及妥協運動像排山倒海般怒吼起來。但因爲這運動沒進於組織，不久却給限制於反對汪逆個人，就沉默下來。

另一方面，國共磨擦却空前尖銳化起來。國民黨內部的一小部份頑固派從去年二月起，「一個」防止異黨活動辦法」之不足，繼之以「對於異黨處理辦法」，又不足再繼之以「處理異黨問題實施方案」，開訓練班，上磨擦課……」（第八路全體將領一月十五日致國民政府電），以及今年二月的「限制異黨兵運實施方案」，在湖南就鬧平江慘案，在河南就鬧礪山慘案，在山西就鬧舊軍打新軍……在陝甘寧邊區就鬧內部的「點線工作」，外部的「封鎖工作」，並且還鬧軍事進攻，此外還曾製造千百件情報先蒙蔽蔣先生，逮捕了大部進步青年，送進集中營，又催請玄學鬼們提出取消共產黨，取消邊區，取消八路軍新四軍，僱請土匪們做文章，大罵共產黨……」（毛澤東二月在延安各界反汪擁蔣大會上的演詞），三月的成都事件（反共投降份子有計劃的搗毀與搶掠四川銀行倉庫和重慶銀行，事後即逮捕與槍斃共產黨人與文化分子……），四月五路軍一部圍攻新四軍江北支隊，綁捉青年女學生裸體游街示威，停閉進步刊物并捕殺愛國青年……，六七月，大規模圍攻新四軍……還不够明白嗎，汪精衛的賣國同頑固派的猖獗，他們兩家裏應外合，把時局鬧得烏烟瘴氣了。

更有甚者，陳誠在韶關演講，不自覺的流出什麼「八路軍游而不擊，延安無一傷兵就是明證」的話兒，程潛却輕信謠言，最近發表什麼「中國共產黨之不法行為及破壞抗戰事實紀要」，于歷數中共「十大罪狀」（？）外，并僉以「在各地事實上所表現，實藉「共赴國難」以取得地位，進而擴充武力，發展組織，以謀不利於國家」……這一時的失言，所得結果，竟助長頑固反共分子的磨擦「事業」的擴大，「殊可惜也」！

但我們知道，「八路軍，新四軍擋住五分之一（十七個師團）的敵人，每月却只領到七十三萬塊錢餉……票子跌價，打個兩折半，每人每月不上一塊錢。爲什麼要取消它呢？邊區是全國最進步的地方，這裏是民主的抗日根據地，這裏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婦，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吃磨擦飯，十沒有發國難財。爲什麼要取消它呢？」所以「……是要學邊區……是全國要學八路軍，新四軍……是全國學共產黨……是落後的向進步的看齊」（相持階級的形勢與任務（上）第七頁）

那麼，在這軍事有進步，政治無進步，團結與分裂兩方面可能性都有的現在，「只有進步，才能團結；只有團結，才能抗戰；只有進步，團結，才能統一」（毛澤東）這理不是很顯明的嗎？所以雖然在有階級的社會裏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但須知道，「復巢之下，焉有完卵」呢？這，對磨擦問題就要大家捐棄成見，睜別本「兄弟鬩牆，外禦其侮」的精神，使所謂磨擦適當的解決，緩和和減弱下去，這樣來鞏固全國的團結，增強抗戰的力量。有了這政治保證，敵僞的挑撥與頑固，反共，妥協分子的從中作祟，不是失掉它的作用了嗎？

正在這時緊時鬆的當兒，由於國際形勢在法國的崩潰下突變了國際的新陰謀又一樣的要反應到中國來，所以「抗戰的空前困難時期也到來了，日本帝國主義正在加緊向中國進攻并宣佈了它的東方門羅主義，中國抗戰陣線中的一部份人，正在發生動搖，而從國際方面襲來的陰謀，則有由德寇的勸和政策，代替英美法東方慕尼黑政策的可能。」這，由於英美的衰弱與德意的鼓勵，日寇就與希特拉莫索里尼

的飛機大砲相互呼應，趁這「千載良機」（最近近衛重作馮婦，組「一黨內閣」，實是表示日寇已到山窮水盡，更仰軍部的鼻息，將進行它最後的冒險作，孤注一擲了），在準備向南洋侵略與加緊向中國正面進攻，一句話，目前時局主要危機是：日本加強對中國壓迫，準備以軍事壓力來打擊，動搖我國抗戰的信心，達到它分裂中國內部，迫使中國投降，這樣解決它的所謂「中國事件」。所以一面面向英、美、法、匈國際交通加以大壓力，使它們誘引壓迫中國，出賣抗戰；一面加緊襄西進攻，重慶狂炸，猛襲桂西與最近封鎖越南緬路線和中國唯一的浙閩海岸，來恐嚇，利誘中國大資產階級，使作內應，同時英法的反動與「有條件」的讓步，天津協定剛「慷」了他人之「慨」就有越南封鎖，香港，廣州灣的封鎖，緬甸「三個月」封鎖。與最近法國的在準備對日更作讓步（是給予日本在安南政治的，軍事的便利，以擾亂我國大後方的滇桂）和美國的「口頭姿態」與三個門羅主義的提倡……這一串串的「往後退」政策不是表示它們力量的衰弱，去討好日本，以保留他們在遠東的權益嗎？又在德意準備襲擊英倫的今天，爲了需要日本牽制美國的海軍與威脅它在東方的殖民地，來共同重新分配世界與奴役世界人民，這，勸誘中國停戰是愈來愈大了，但，同時國內部份大資產階級因爲一面他們的主子（英、美、法……）「自顧不暇」會糟糕了他們的「前途」，另一面什麼百分之四十九或五十一的「中」日「合辦實業」，他們哪不躍躍欲試呢？更重要的是國內大衆的空前覺悟，這防礙了他們的「前途」，又抗戰下去將更需要蘇聯的援助，這又怎辦呢？所以及早來個具當式的「光榮的和平」，「徧安一隅」，不是更好嗎？所以雖然反共已將臨近它的低潮，他們還作反共的思想動員，輿論動員……到處發動，更「演習」大小的武裝進攻，來作分裂投降的準備……所有

這些，日本國際與國內三方面的匯合，確造成抗戰逆轉的新危險。

但是由於國共兩黨的堅決抗日，特別加上人民大眾的空前覺悟，使革命的天秤起了很大的變化，『誰要是對侵略者妥協，以中國的人民爲犧牲，像一九二七年所做的一樣，他一定不能獲得中國人民的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內幕第一四二頁）還要吃他們無情的一頓鉄拳同時，是蘇聯的強大與它國際地位的日益提高，積極的援助與支持中國抗戰；又英，美由於歐戰牽連，或日本的從速締到緬甸的海岸封鎖，使它們對中國的影響減低與不可能起作用了；又中國大資產階級間的內部矛盾本來非常厲害的，由於日寇的加緊正面進攻，使它的內部的一部份已轉好或在轉好，繼續着抗戰，這樣，它們的力量更可憐了；再，抗戰三年已使日寇在內外危機重重壓迫下，力竭聲嘶了……所有這些，如果把握得牢，集中一切抗日進步力量，抗戰到底團結到底地抵抗一切投降倒退力量，是可能爭取時局好轉，挽救時局逆轉的。

這，七月一——八日的國民黨七中全會除決定設置經濟作戰部與中央設計局外，更鄭重指出：『最重要的問題，還是要我們本身堅忍不拔，自強不息的精神基礎』那麽，『則國際局勢無論如何變化，於我國只有益處，而決不會有什麼不利的地方』、『我們經過了三年的血戰，我們真是增加無限的自信』、『同時要』時時準備着最嚴重最困難時期的到來』（蔣委員長閉幕辭）『珍重已有之成績，認識後死職責之艱巨，尤應坦白自知過去之刻苦不足，努力不足，自今伊始，必更加强在政治經濟軍事上之奮鬥……一切黨政工作，尤其各級行政，必須確實迅速，整齊嚴肅，廉潔勤慎，守法奉公，使時無虛耗，人無曠廢』（大

會宣言。這坦白自承的態度，令人起敬；我們相信，國民黨人一定能本着這一精神，加強國內團結，適當解決磨擦，以竟抗戰建國大業的。

同時，中共在「爲抗戰三週年紀念對時局宣言」中更清楚號召全國，抗戰到底，團結到底；宣言指出：「……帝國主義大戰現已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法國的失敗是反蘇反共的結果，這不教訓了我們中國抗戰勝利在更要加緊聯蘇共嗎？——健）……革命危機正在一切被壓迫人民與壓迫民族中間深刻的醞釀起來，我們是處在戰爭與革命的新時代……中國抗戰可靠的朋友，正是蘇聯與全世界人民。」但在新困難新危險的今天，「全國必須加緊團結內部磨擦必須消滅，國共關係必須調整，內戰危險必須根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必須鞏固！」「我們是始終實踐自己的諾言的，」來約束自己的黨員與軍隊，「我們現在重複聲明：在整個抗日戰爭與建立民主共和國的時期內，我們將始終執行三民主義的政策；」同時「我們要求國民黨亦尊重它自己的諾言，認爲實踐其允許過人民與允許我黨一切政治上與具體問題上的條件，以利團結與抗戰，」更「放棄對共產黨的破壞政策；以保證兩黨的團結一致與長期合作。」因此爲了要克服即將到來的空前的投降危險與空前的抗戰困難，「必須實行抗戰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必須釋放一切被捕的共產黨員與愛國份子，必須承認一切抗日黨派的合法權利，必須召集民主的國民大會，必須廢除有害的特務工作，必須改變不適宜的財政經濟政策，文化教育政策與兵役政策，必須把抗戰的重心放在自力更生上面，而不應該依賴任何不可靠的外援。」「當此民族危難深重之時，我們一得要執行孫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義與聯俄聯共援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執行他的臨終

遺囑，打破一切悲觀動搖與沒有出路的情緒，不屈不撓再接再厲的奮鬥下去，則投降危險必然克服，抗戰必然勝利，建國必然成功，中華民族的前途是無限光明的！『毛澤東更在團結到底一文中指出，『我們所反對的只是敵人與堅決的投降份子及反共份子，其他一切人都要認真團結他們，』『一切共產黨員須知只有抗戰到底才能團結到底，也只有團結到底才能抗戰到底，因此共產黨員要作抗戰的模範，也要作團結的模範』這種以身作則的精神，我們希望共產黨人能大大發揚它。

抗戰三年，中國已踏上從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到新民主主義社會的過渡階段，使革命的動力已有很大的變化，抗戰派遠遠超過主和派，且有決定的作用，不過現在還沒夠團結就是了。大資產階級雖然在幹着「結束抗戰」的勾當，但他們人數少得可憐，又缺乏大眾的支持，以及內部的不統一，使得它容易爲革命力量所收拾的，假如它們一意孤行，不自悔悟的話。另外，抗日派包括全國人口大多數的工人，農民，小有產者，一切進步的工商業者（中等階級），一部份有正義感的，有氣節的公正士紳及所有他們的政治領袖；他們，特別工農是我國戰勝國內外敵人的最可靠的力量，將成爲今後抗戰力量的基礎。他們將更大團結，孤立大資產階級及減低其影響，使就是叛變也不能多大妨礙抗戰的進展。然而抗戰的第四年將是我國抗戰最困難，最危險的一年。

一三 「抗戰的第四週年，將是最困難的一年。」

抗戰的第四週年，將是最困難的一年。

因爲是在「投降爲時局最大危險，反共則是投降之準備」（引自中共前年七月七日的宣言）下，國內一部人士正在策動所謂新的反共高潮，企圖爲投降肅清道路，擬以所謂中日聯合剿共結束抗戰局面，以內戰代抗戰，以投降代獨立，以分裂代團結，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險，其計至毒，道路相告，驚心動魄，時局危機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引自朱彭葉項去年十一月九日的佳電），所以正如中共於去年七月七日的宣言指出：「空前的投降危險與空前的抗戰困難，已經到來了。」

正在這個時兒，法國投降，致使國際風雲起了空前巨大變化。英美爲了挽回它們「世界」的頹勢，急不擇待，以封鎖緬滇公路，企期日本在三個月內解決「中國事件」，達到「中日和平」（這，後來英國首相於緬滇公路重開前天答覆國會質問，不打自招地直供出來了），來挽救那接近英美，傾側欲倒的米內內閣之命運；但這一記注射針已來不及了。於是傾向德義的近衛，再作馮婦，重組新聞，他仗着德義赫赫餘威，「不能等待重慶政府緩慢地自行停戰抗戰」，而使它「在日本威脅下悲觀失望」（借用新申報今年二月七日時論語），來結束他們的「聖戰」呢！這樣一來，美國版的「華盛頓會議」和英國版的「慕尼黑會議」的暗影從此暗逝了，而國內反共密謀也逐漸鬆弛起來了。

一方面，中國英美派感到團結的可愛，蘇聯的可靠；一方面，親日派的反共醞釀和德義的勸和準備——日本就捉緊這動亂關頭，計劃一如德國施諸於法國那樣的，向中國來個十月總攻，企圖下西安，下重慶，下昆明，以便這樣和親日派（加上德義）裏應外合，使中國「屈膝」。

這一個宏大企圖，中共是看得很清楚的，一如解放週刊指出：「正當着國際形勢大變時，日寇欲乘機迅速解決中國問題，發動襄宜戰役的進攻，接着封鎖西南國際交通，并企圖進攻洛陽，審夏和甘肅省，先以切斷西北之蘇交通及大規模轟炸我們重慶，加緊政治分化與逼我投降的時候；正當着日寇在華北敵后加緊築堡修路，封鎖河川，破壞我根據地的人力，財力，物力，而進行其「治安肅匪計劃」的時候；正當我國抗戰到了第四年頭，投降妥協的危險與國難空前增加的時候，華北的八路軍主力，就以百團精兵，於八月二十二日從多方面大舉向華北敵寇進攻，沿同，蒲，正，太，白，晉，平，漢，北，甯，平，綏，津，浦等各鐵路及華北各公路敵人企圖包圍之各據點進行空前未有的大規模戰役進攻，結果，娘子關的大勝利，太原的一度收復，正太路我軍陣地的日見鞏固，并「始終將華北四大鐵路，牢牢封鎖，和使日軍無法增援反攻」（引自去年九月二日合衆重慶電）達一句以上……

這樣，「在目前的形勢之下，百團大戰雖然是勝利的游擊戰爭的戰役進攻，但它帶有全國性的偉大的戰略的意義。」八路軍的領導人——朱德繼續指出：「首先，它牽制了敵人進攻我大西北后方及進西南的企圖……而我百團大戰的偉大勝利，就部分地錯亂了敵人的部署，至少要延遲敵人的進攻，同時更加鞏了全國同胞的勝利信心，促進全國團結，使敵人困難實現其威迫利誘的陰謀；其次，（它）打破了敵

人對付我抗日根據地的囚籠政策，敵人企圖利用它的鐵路公路據點和碉堡來封鎖我抗日根據地，然而我們則必須切斷敵人的交通命脈，以制敵之死命，因此敵后戰爭的鬥爭形式，主要的是交通戰爭……最後，（它）嚴重的打擊了敵人的「以戰養戰」的陰謀……」

但同時，由於各線友軍却始終保持休戰狀態，可讓日軍會集華北，嚮志對付八路軍，由於「難分子母大興土木，謂以對日軍，則非其地，謂以對同胞，則非其時」地一面於「邊區」周圍駐軍，已達二十餘萬之衆，「一面則「更動員民夫，配備部隊，耗鉅額之經費，築萬里之長城，名之曰封鎖線，西起綏夏，南沿涇水，東迄河濱，縣互數省，規模宏大……」（俱引自蕭勁光去年十月十七日的通電），又由於九月政府的一道通令，什麼「交通梗阻，會員不能如期到會」作爲理由，無限期延宕了國民大會，這樣使百團大戰的偉大勝利，在前對日寇，后有碉堡的「借刀殺人」政策下，功虧一簣了。

九月，國際混亂情勢已逐漸澄清，由於美國的加緊援英，德英力量比重已日見平衡，就促成德日義的三國同盟的訂結，來共同牽制美國。瓦解大英帝國，三分天下，日本在本身無力與百團大戰摧其餘威后就不得不在德國的指揮與計劃之下，對中國戰爭依然回到以政治進攻爲主的老路上去，而在對南進政策上，却積極的作起軍事準備來了。

同時，英美一面感到日本南進的危險——在攫取它們的太平洋，一面又知曉中國抗戰的重要——在吸住日本百萬大軍於中國這個泥潭裏，於是，美國策動，英國同意，十月，綏濱公路重開了。

英美爲了更進一步，使中國成爲它們在太平洋的國防第一線和對它們「世界」效勞起見，美國就

有十月二千五百萬美元借款與十一月萬萬美元借款，英國也有十二月的千萬磅借款。於是英、美派又趾高氣揚，對他們的「主子」五體投地，有了英美，就無需蘇聯了；又有恃無恐對國內進步力量又重新燃起反共之火了。

但日本究竟棋高一着，已清楚了從政治的分裂到政治的衝突的汪派和平運動之顯得無力，而注重於既利且誘來撮合親日派（以何應欽爲首領）和汪派合流，以便從軍事分裂到軍事衝突，來造成中國內戰。所以不久日軍就從桂南自動撤退，同時不透露如果「甯」渝合作，全面反共，那華中、華南日軍當即撤退，但還默契在日軍撤退前，必先令共產軍撤離這些區域，然後由中央軍來接防。於是中國的「大人先生們」高喊：中國所要求的，不是屈辱的和平，而是「光榮的和平」；中國素有大國風度，抗戰是出於不得已，只要日本不相煎太急，中國決不計舊仇，靜待國際情形的發展；此番戰爭，決非武力結束，而係以外交方式結束；重慶之真正國民政府，將於六月內遷回南京……說穿，他們的目的只要一個——就是用「全面和平」來代替「持久抗戰」。

跳加官後，當然就是正戲上場，十一月十三日的日本御前會議，就決定對於中國事件的解決，願和蔣介石談判，并希望渝國府最好能在日本正式承認「甯國府」之前，考慮和平；同時，并授意汪於二十七日發表感電，於希望蔣再作一度慎重的考慮，「俾全面和平早日實現」，這一庶可速圖內政之修明，外交之發展；外，并以「主席」相讓，雖犧牲「己」，亦所不辭。這雖然沒得預期的收穫，但於所謂「中日調整國交條約」之簽約後，日本却姑作暫不承認，和德國的徘徊觀望。這樣地留人餘地，以便將來作談判或勸和的

資本。

同時，在自由中國裏，頑固反共派——以在西安事變時，陰謀製造內戰企圖奪取大權的何應欽爲首的親日集團，却間接通過英美的影響於每次英美擴大對華援助的時候，加緊擴大反共浪潮，來達到他們反共投降的目的，和利用英美派的懼怕國內進步勢力抬頭的成見，從中煽動挑撥，以便降日反共與抗日限共合流，迂迴曲折地來走他們「一黨專政」的道路。他們緊握了當時日德的勸和與英美的援助，於是統一戰線頻於分裂，空前磨擦起來了。

那麼，磨擦從何而來呢？

從理論上來觀察：

首先，是由於中國是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這個社會是表現在大有產者與大地主以舊中國的社會秩序與封建統治長期壓迫人民，阻滯進步的官僚政治上，而這個官僚制度已長期籠罩着與滲透到全國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因而在各方面阻礙了中國的革新與銳進，和戕害了民族的元氣與精英，這是基本的；

其次，是由大有產者與大地主，他們一面害怕羣衆和爲自私自利的利益所迷醉；另一方面，又害怕強大的日寇和爲日寇的誘降政策所迷醉，因此他們企圖中心抗戰，要投降；但是有共產黨與八路軍新四軍在，投降是困難的，所以他們投降就首先反共反八路軍新四軍，這才產生了一切對付異黨的方案和辦法。而他們的親日派首要份子，早已潛伏在黨，政，軍各機關中爲數頗多，待機起事，更加上他們的英美派支持

與同意下，經日寇煽誘，反共與限共就合流了；

又其次，是日寇的陰謀，在三國同盟的訂立以前，它一樣急於用各種方法謀解決中日戰爭，以便使中國成爲它的殖民地，以後，更急於積極策動中國內部的變化，目的在借中國人的手，「以華制華」來鎮壓中國的抗戰。鞏固它南進的後方，以便放胆南進配合着希特勒進攻英國，三分天下的行動。

最後，是國際帝國主義無所愛於中國，因爲它們只願後者成爲它或它的保護國或殖民地；反之，如中國革命成功，不但消失它們在華的一切藉不平條約得來的利益，和引起東方殖民地革命，打擊它們的大後方，更甚焉者，還要摧毀它們資本主義王國，通過世界革命，而達到共產社會呢！嚇還了得。所以就是英美（德意已如上述）爲了它們世界的自私自利，阻止中國革命完成和幫助打擊中國國內革命力量，就成爲必然（雖然因時而異，這詳見本書六章）了。

理論方面既證明磨擦無法迴避，那實際方面將怎樣呢？

一九三八年二月以陳立夫爲中心，組織反共小組——藝文社；他先聯合汪兆銘，并得到一部份元老吳稚暉，張繼等的諒解，由陳果夫，周佛海，會養甫，張道藩，丁默村等組織的。後來張國燾在給中共開除後，才加入了。這藝文社的成立，是國民黨方面防共措施的第一着，跟着就有一月破壞新華日報，二月禁止延安快報與一黨掃政問題，三月陳獨秀問題，五月——八月禁止進步刊物和解散漢口民衆團體了。另外，在軍事方面，就由磨擦掃家張蔭梧開其端，對八路軍進攻，有四月邢台，十二月的修武，新河，東鹿（都在河北省）……無數次的小衝突，不過由於八路軍的處處讓步，顧全大局，才不至擴大磨擦裂痕。

但一九三九年因爲前線沒大戰爭（詳見本書第十一章），磨擦却愈來愈兇，什麼「共黨問題處置辦法」、「異黨問題處置辦法」、「處理異黨實施辦法」、「淪陷區防範共黨活動辦法」、「第八路軍在華北陝北之自由行動應如何處置」、「陝甘兩省防止異黨活動聯絡辦法」、「運用保甲組織防止異黨活動辦法」、「防止異黨兵運方案」……的一連串的辦法方案，它們無論在宣傳、組織、黨務、民運、行政、軍事、特務諸方面，均定有周密的反共計劃；無論在後方，在戰區，在游擊區，在淪陷區，在陝甘寧邊區內外，都定有具體的實施辦法。其中最重要的如：令中共服從命令，執行法令，實行三民主義，取消一切「特殊化」行為及組織；所謂陝甘寧邊區政府爲非法組織，不許存在，取消晉冀察邊區行政委員會，冀中、冀南兩主任；取消第十八集團軍的補充兵招募所，取消河防司令，取消晉冀察軍區，取消第八路軍名稱，封鎖陝公及抗大等等。這些辦法，不單單制定，也相當實施了，所以另一磨擦專家秦啓榮就在山東關任縣，北馬莊與在河南竹溝井其他份子關平江、隴東諸多衝突了。

因此，毛澤東於九月十一日與中央社記者談話時，代表中共表明共產黨對待所謂磨擦的態度，說：「我可坦白的告訴你們，我們根本反對抗日黨派之間那種互相對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橫逆，如果一定要來，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實行壓迫，那共產黨必須用嚴正的態度對待之。這態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以禮待人，這就是我們的態度，但我們是站在嚴格自衛立場上的，任何共產黨員不許超過自衛原則，這種事實大家可以看得到的……」

但國民黨不但不自檢省，反變本加厲，在反共的張羣（親日派）、朱家驊（親德派）輩發表談話，否

認中共的存在，和蔣鼎文預言掃蕩陝北的時期的不久，蔣介石却也對德國記者發表「中國沒有一個共產黨員」的話，於是這個裂痕很難彌補了。

到了一九四〇年，更加天翻地覆，無法無天，一月八路軍爲了團結與抗戰，不得不於解決張、秦部隊和調解山西新舊軍衝突；但國民黨的部份頑固反共份子不此之圖，反有一月陳誠的反共演講，三月的效仿希特勒火燒國會地的來個成都搶米，嫁禍中共，五月衛立煌等的反共通電，和二月——七月的進攻新四軍。還有更甚焉者，程潛發表了「中共不法行爲及破壞抗戰事實紀要」，欺說了中共的十大「罪狀」，什麼「解決及圍攻抗戰部隊」，「破壞行政系統」，「軍隊不服從命令，擅自行動」，「煽動掩護新軍叛變」，「封鎖國軍培養」，「搜索民財，民食，強佔民田」，「破壞金融，禁用法幣」，「販運仇貨」，「挑撥民族情感，分裂抗戰力量」與「逮捕并殘害公務人員及無辜民衆」等。中共也爲了團結與抗戰，就於四月編磨擦從何而來揭破「頒發此等文件之人爲達到製造反共磨擦之目的，不惜造作謠言，抹煞事實，顛倒是非，混亂黑白，以便煽惑人心，製造事件」（見該書二頁）的用意。

這是從抗戰到一九四〇年七月磨擦的概括情形（本書十二章却多方面述到這問題）。在三年一書裏有很好的說明：「（經過）——關於軍事方面：我們收復河北後，鹿主席來了，他最初同意我們的綱領，但後來又取消民運及抗日政權，要趕八路軍出河北。正好敵人「掃蕩」來了，八路軍未走，他們走了。八路軍打退敵人，他又來解決八路軍，并不惜下委任狀給「皇協軍」，以之作爲反八路軍之力量，我們能不自衛嗎？……總之，堅持敵後抗戰，須人民幫助，不然不能生活……關於政治方面：（他們）就在冀縣另

來一套，結果這一套就成爲日寇工作之基礎，竟成爲河北的敵人模範縣……我們自然不贊成，自然要堅持人民得來的工作基礎，於是自然又發生磨擦。事實證明敵後抗戰堅決，必須抗日政權的配合……被民衆遺棄了，自己不能立足，又如何怪我們呢！——這不是一樣可以說明其它的地區嗎？

這三年來，已建立了晉察冀，冀中，冀南，平西，晉冀豫，晉西北，冀魯豫，魯西北，魯南，大青山，冀北，皖北，皖南（今年一月給顧祝同蓄謀聚殲了）等敵後抗日民主政權，不但八路軍，新四軍攜手，而且華北，東北與華中打通了。

敵後抗戰的成績呢？三年一書又指出：「我們發動了華北（連同華中）一切不願亡國奴的同胞參加了抗戰，他們不但已組織起來，而且在三年的鬥爭中，已鍛鍊成爲獨立的偉大力量……誰要用腳踏他們，誰就要粉碎！」——我們在龐大的羣衆參戰的基礎下，不但消滅了敵人，而且還發展了自己……無論敵人如何恨我們，甚至提出和實行「肅打八路军」——（連同新四軍）——但老的打不完，新的又打出來了！——我們在羣衆運動的基礎上建立了華北（連同華中）廣大的抗日根據地，恢復了國土，樹立了抗日政權，打擊和瓦解了漢奸傀儡政權……如果沒有頑固份子從各方面來破壞，這些地方，就比現在更好！」——我們在羣衆運動基礎上，在各抗日根據地中，實行民主政治：「我們在統一戰線的原則之下，適當的改善了人民生活……在那裏雖然在堅苦的鬥爭中，但是人民都說『現在抗戰比不抗戰生活要好……』」「我們在廣大人民和軍隊中發動廣泛的生產運動，開荒種地，大家都先發展手工業，舉辦生產和消費合作社……」和「實行抗戰的文化教育政策……盡力提高民族自尊與自信，以堅持抗戰到底。」

這樣，千百萬人民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權下第一次新生，學會運用「我們的政權」（這政權是由他們參加，執行和享受，所以是我們的政權）了。那麼，頑固反共派怎的魂飛魄散呢？

所以，自七月以來，磨擦更表面化，他們就企圖以通過反共磨擦來達到保持他們自私自利的利益啊！但是中共還是爲了團結與抗戰來調整國共關係，就提出六月提案，其內容：（一）保證各抗日黨派存在的合法權；（二）釋放拘禁的共產黨員，解除對共產黨出版物的禁止；（三）解放游擊區地方行政權；（四）承認游擊區內發行的地方紙幣；（五）在陝甘寧區二十三縣設立邊區政府，直屬行政院，并委任現任邊區主席林祖涵爲邊區政府主席；（六）將八路軍擴編爲三軍九師，其所屬游擊隊，應給予與各戰區所屬游擊隊的同樣待遇；（七）增編新四軍至七分隊；（八）成立八路軍新四軍與中央軍的作戰疆界和（九）供給八路軍新四軍的武器，彈藥，糧秣，應與中央軍同樣待遇等等（撮自今日之磨擦問題）

由周恩來，葉劍英代表和國民黨代表何應欽，白崇禧於七月開始在渝談判，國民黨則提出七月對案，之後又提所謂中央最后決定的七月提案；中共也就決定八月對案，來作最後談判。結果，由於國民黨不誠意，閃躲迴避，談判就不得要領。不過，由於東方慕尼黑陰影的消逝，渝國府就承認——也許可稱是這次談判一點滴的收穫——八路軍從三師擴增到三軍。

但三國同盟的簽訂後，日軍暗示掃打八路軍各線都休戰或撤退，獨於華北却集中最精銳兵團，對八路軍作「殲滅戰」，從日軍八——十一月的軍報揭示，九成是關於對八路軍新四軍的戰事的，這不是配

合親日派的內應嗎？同時，親日派因爲德意日的重合，與煽誘（外加英美派的同意限其）也壯了胆，做他們滅共投降的整個計劃了。十月，已決定「北守南攻」的內戰戰略，更輔以「各個打破」與「借刀殺人」的戰術。爲什麼這樣呢？因爲新四軍較弱，可以利用他們北移的機會（詳見後），消滅它，或者藉日寇的手在路上襲擊消滅它，又或者頑固反共派他們自己指揮軍隊來消滅它。這樣日汪何由默契而必至合流了。

計劃決定了，跟着不就是執行嗎？於是九月，十月下令發動了冀南，晉西，魯南，蘇北，皖北，皖南六處的反共戰爭，特別是黃橋事件來得最嚴重。事實是這麼，新四軍管文蔚部駐在揚泰一帶，屢受韓德勤的攻擊，而同時陳毅駐蘇南，亦受冷欣壓迫，不得已率兩團人，渡江與管部會合，但仍受攻擊不已。九月中由蘇北晉紳韓厥鈞，黃逸峯等。電勸各軍停止衝突。當時韓要求退出姜堰，陳部就答應，退出了。但韓却即召主力八十七師，一百十七師，三十師及獨立第六旅一萬六千人，以東台向陳部五六千人包圍進攻，在進攻前，韓部數千不願內戰重演，紛紛過來參加新四軍；在戰鬥時，由於「人民的制裁」（陳嘉庚語）所以陳部根本沒多大參加戰鬥，更加上抗日戰士「倒戈」（陳嘉庚語），「人不願打敗而願繳槍，不願打同胞而願打日本」（借用毛澤東一九三五、一一、二六致東北軍書語），這裏戰到十月六日，韓部除傷亡逃跑三四千人，軍長跳水，二師長被俘外，全部都放下槍桿子了。

這裏一來，頑固反共派的計劃又成泡影，於是一不做，二不休，十月十九日以何白名義命令八路軍，新四軍迅即集中河北，察哈爾二地。十一月九日朱彭葉項同電：於指出當前危機外，對新四軍調防（雖然這

是全無道理的。問題表示接受，但要求略寬限期，因敵後大規模軍事移動，不是容易移行的，同時新四軍係由當地人民組成，爲抗日與防衛鄉土的部隊，一旦遷駐河北，確有困難，又河北天災，土地荒廢，給養困難，所以希望對這再加考慮。

但何自全不理會這些，於是製造「輿論」，如中央日報大公報掃蕩報以及港滬各御用報，不但露出新四軍調防消息，并著論指摘新四軍違抗命令或要求嚴厲懲罰。而淪軍事發言人却於十一月二十一日提早二十天，透露了（本來任何軍事行動是絕守秘密的）本來十二月九日才下的調防命令（十二月底集中江北，一月底河北），又當時國民黨許多特務人員，即將新四軍北渡消息，到處宣傳，向敵人洩露：「這不是向日本打招呼，叫它預先佈置來截擊新四軍，達到他們「借刀殺人」的陰謀嗎？同時更於蘇北皖北屯集二三十萬大軍，在梁園設立「掃蕩新四軍總辦事處」，準備日軍滅不了它，就由他們親自來動手了。還有十二月，——何應欽就停發八路军和新四軍的餉彈，并聲明不承認八路军新四軍爲國軍，這不是有決心進行內戰，有決心分裂國共合作嗎？

但皖南新四軍在朱彭葉項的佳電（十一月九日）未獲批准，但只准延期一個月，限於今年一月底北渡後，爲表示遵從上級命令起見，葉挺即親見顧祝同，交涉北移路線，并獲答應在北移經茂林箐國時領取經費子彈。於是一面，「在十二月，我軍部許多人，全部行李，及軍醫軍需軍法三處全部人員，業已全部北移；我項軍長，周參謀長，袁主任，及其他三要長官家屬，均已北移來到了蘇北。」一面，「我軍在皖南發表了告別皖南民眾書，并且向當地士紳及該地友軍進行一切告別手續，我醫院交給了當地的紅十字會，我

有糧食三萬石亦全部交給當地專員公署」(見皖南問題的報告八頁)這不是決心遵令北移嗎?

至於經過甯國向蘇南轉移是由於：「(一)我們不能走銅陵繁昌渡江到皖北(本來，蔣委員長，第三戰區所指示的路線，一條向銅陵渡江，一條向蘇南轉移北上，都無限制)一方面鬼子在銅繁嚴密封鎖長江，不能通過，而且李品仙聽到我北渡消息時，即以三師開至江邊無蘆江一帶，控制渡口，封鎖長江，扣留船隻，李品仙不願我經皖北北移。(二)我軍部隊甚大，一萬餘人不能在敵人據點附近運動，而且必須離敵較遠之路線通過，所以不能從涇縣以北通渡青弋江，必須經過茂林甯國向蘇南轉移。(三)青弋江在涇縣以南有一狹涉點，河面較狹，容水較淺。(四)第三戰區要我軍至甯國一帶領取子彈經費」(前書八——九面)。

「最後……部隊萬餘人，即於一月四號，由雲崑出動，經由涇縣以南至茂羅地帶，過青弋江至甯國，向蘇南進發，以經由蘇南渡江北上，不料我軍五行至茂林太嶺的地方」(前書七頁)。「六日——十四日，被顧祝同，上官雲相指揮七萬大軍，重重包圍，致突圍不得，苦戰八晝夜，終因彈盡糧絕，慘遭消滅，全世界聞名的葉軍長，受傷被俘去了，我們優秀的領導者項副軍長，袁主任，周參謀長，則生死不明，我們在皖南與日寇血戰三年，八次保衛了繁昌，克復涇縣的堅強而光榮的隊伍，竟被圍殲了」(前書三頁)那麼，誰打誰，至此不更瞭然了嗎?

在戰鬥時，除國民黨擔當三面外，十三日十五日，日軍和「和平反共軍」也來担当剩下的一面同時，在江北，國民黨的二十萬大軍，和日本配備的七萬大軍，他們攻擊的對象顯然只有一個——蘇北的新四

軍及一部份八路軍。這次事變說明了：在反共的擴展上，這次日寇對初度「合作」許會更進一步，中日和平的！

它又說明了：頑固反共派怎的一面故意用「命令」的方式，一面卻設計引誘聚殲，一面自己下令，一面自己違法，一面自己造法，一面自己毀法，這完全是日寇幫兇的行爲！

因此，它更說明了：今後這些「命令」根本沒有服從的必要了，因守罰，違賞呢！所以同時讓步的階段是完全結果了，而項英在這次事變中，就忽略了對同盟者的防範，應甚於對敵人的列寧原則，他先太相信了願祝同的人格担保，二在行軍時一點戒備也沒有，和最後當戰鬥時又猶豫不決。所以不能大意，要提高最大的政治警覺性，才不受人暗算，才能保障與擴大革命之果！

皖南慘變是演出了，但是解鈴還在繫鈴人。因為，除上述頑固反共份子的陰謀反應於事實上外，「皖南事變的犧牲者，大都是中共黨員，新四軍是共產黨領導下的軍隊，他是與共產黨不可分離的。猶如其他國軍是國民黨軍隊與國民黨不能分離一樣，而且現在全國到處都壓迫，摧殘共產黨員與進步的青年，因此，皖南事變，不是簡單皖南問題，而是全國的問題，是國共二大黨的問題」（前書二五——二六頁）。所以，負慘變的責任的國民黨對這事變的態度，「即國民黨當局是否就此同共產黨分裂，進行內戰？」（前書二二頁），是極爲急切要知道的了。

直到十七日才由軍委會通令，說新四軍「違反軍紀」、「抗命叛變」、「襲擊友軍」、「佔領防地」和「妨害抗戰」（後兩項是蔣介石後來加上的），所以「爲整飭軍紀」就取消番號，全部解散，審判軍

長了。

但這是頑固反共派的莫須有的栽誣。

他們說：「新四軍攻擊友軍，不聽命令。」其實，如果皖南新四軍事先有準備的話，那何至於全被殲滅呢？誰不知道，新四軍堅持大江南北抗戰三年，與日寇打了二千多次的仗，都是百戰百勝的，誰不知道新四軍一向是尊重友軍，協助友軍，如在皖南配合友軍收復涇縣，在江南協助友軍破壞公路，在蘇南是如何尊重抗敵的友軍（如魯蘇皖稅務團），這都是大家週知的事實。皖南事變，也是新四軍服從了命而受殲滅，所以此後他們對於違背抗戰團結的命令，企圖消滅他們的命令，他們是絕沒有接受的義務了，而且，其他抗日的友軍，對命令也有效忠執行的必要，都應該反對這種毒辣的陰謀詭計！

他們說：「新四軍破壞政權，陰謀叛變。」其實，在皖南的新四軍是如何地尊重地方政府，這次向北移動的時候，他們皖南軍部曾向當地鄧專員，各縣長接洽與告別，并把米糧三萬餘担，印刷所報紙等都移交鄧專員，在蘇北，他們所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權，召開參政會，各黨各派紳士都熱烈參加，這是眞眞符合抗戰建國綱領，實行民主政治，這都是大家所通知的事實。皖南事變，正是說明了一黨專政，摧殘異己，所以中國要爭取抗戰的澈底勝利，只有結束一黨專政，肅清何應欽等一切親日份子，頑固份子，實現全國性的抗日民主政府，而且，大家都應該反對這種口是心非，慘無人道，毫無法紀毫無信用的當局！

所以軍委會的通告與談話公佈後，舉國譁然，羣不值何白的所作所爲。

海內外函電質問，如上海各界民衆團體快郵代電指出：『縱有誤會，亦不難以政治手腕解決之，何忍

兵刃相見，而貽同室操戈之譏……務祈領袖諸公，念我祖宗血地，尙未恢復，半數同胞，正陷水火，相忍爲國，團結對外，并盼全國同胞，一致呼籲，終止磨擦，消弭內戰……」如美洲洪門總會通電：「……此時若因國共磨擦，弄成分崩離析，則前方慷慨之英勇將士，不獨頭顱枉擲，寶血空流，卽我全國同胞之盧舍城邱家產蕩然，顛沛流離，與我後方之海外僑胞之踴躍捐輸，犧牲一切，亦屬枉費血汗，結果仍淪爲無國之民也。言念及此，誰不痛心……今爲我整個國族之生存計，敢以血誠，向我國共兩黨呼籲……公等……親自會而，開誠相與，自解糾紛，至爲上策，如卽若不能，則共和國家，主權在民，由蔣公領導，經毛公同意，召集各黨各派各界領袖，組織特別委員會，以爲國共兩黨之仲裁，亦未嘗不可。苟國共兩黨獲得精誠團結，蔣公之領導抗戰，前途必更順利。如能及時召集真正代表民意之國民大會，制定國家大法，奠定民主基礎，鞏固抗戰大局，則不祇內訌可永不發生，卽暴敵之政治攻勢更無所施其技也……」

各友邦對此亦深感不安，如蘇聯它警告「這次行動如演變爲內戰，那只好削弱中國了。」（真理報一月二十七日）如美國，它表示「美國所予的同情與援助是希望，中國不獨自由而且亦民主化的。如中國內戰發生，美國將不願援助任何一方」（紐約時報三月十二日）……

就是國民黨員如宋慶齡柳亞子何香凝等亦聯名給蔣介石書：「今日大敵在外，內已一致，一切問題，在乎發展內容而不拘束形式，在統括大體而不苛求枝節。」「乃有勝利抗戰以進入第五年度……而剿共問題，恍若迫在眉睫，引起國人惶惑，招致友邦疑慮，又因以便利敵人之乘間抵隙。」所以應「撤消剿共部署，解決聯共方案，發展各種抗戰實力，保障各種抗日黨派……」

但做偽却大喜若狂了，一月二十日「審國府」發表談話，「重慶方面不乏明眼之士，所望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認清和平反共之必要，與和平建國之真義，於此國家元氣尚未盡失猶有可爲之時，幡然改圖，同立於統一領導下，共同奮鬥，使全面和平得以早日實現……」三十日松岡對國會說：「我人雖已承認南京政府爲中央政府，然仍期待重慶與南京合流時期之到來……只須蔣反省合作，共謀全面和平。」

兩相對照，我們應知何所適從了。

因此，爲了催促玩弄火燄的人反省，一月二十二日中共軍委發言人就皖南事變發表談話，指出：「此項事變醞釀已久，且前之發展，還不過全國性突然事變之開端而已。」發令者敢於公開發此反共命令，冒天下之大不韙，必已具有全面破壞與澈底投降之決心。」同時他們，「中國軟弱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沒有後台老板是一件小事也做不到的，何況如此驚天動人的大事。」至於重慶軍委員發言人的那一篇，只好拿「自相矛盾」四個字批評之。在重慶軍委會的通告中說，新四軍叛變，又在發言人的談話中說新四軍之目的在開到京滬杭三角地區，創立根據地。就照他這樣說吧，難道開到京滬杭三角地區，算是叛變嗎？愚蠢的重慶發言人，沒有想一想，究竟到那是先叛變誰呢……重慶發言人是個蠢豬，他們把他們的父親的計劃洩露了，他們不大打自招，向全世界洩露了日本人的計劃。」關於新四軍部署問題，中共中央軍委會已於一月二十日下了命令，任命陳毅爲代理軍長，張雲逸爲副軍長，劉少奇爲政治委員，賴傳珠爲參謀長，鄧子恢爲政治部主任，（他們一月二十五日於鹽城通電就職了）該軍在華中及蘇南尚有幾萬餘人，雖受日寇每與共軍夾攻，但必能艱苦奮鬥，盡忠民族國家到底。同時他的兄弟八路軍各

部，決不坐視他陷於夾攻，必能採取相當步驟，予以必要之援助。這是我們可以率直告訴你們的，『最後，如果這班人能够冷靜的想一想，他們就應該老老实實的，並且很快的去做下列幾件事：（一）懸崖勒馬，停止挑釁；（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動命令，並宣佈自己是完全錯誤的；（三）懲辦皖南禍首何應欽，顧祝同，上官雲相；（四）恢復葉挺自由，繼續充當軍長；（五）交還皖南新四軍全部人槍；（六）撫恤皖南全部新四軍傷亡將士；（七）撤退華中剿共軍；（八）取消西北的封鎖線；（九）釋放全國一切被捕的愛國政治犯；（十）廢止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十一）實行三民主義服從總理遺囑；（十二）逮捕各親日派首領，交付國法審判。如能實行以上十二條，則事態自然平復，我們共產黨及全國人民必不過爲己否則，『恐季孫之憂不在端者，而在蕭牆之內。』必然是『搬起石頭，打他們自己的脚。』那時我們就愛莫能助了。我們是珍重合作的，但必須他們也珍重合作，老實說，我們的讓步是限度的，我們讓步的階段，已經完結了。他們已經殺了第一刀，這個傷痕是很深重的。他們如爲前途着想，他們就應該自己出來醫治這個傷痕；『亡羊補牢，猶未爲晚。』這是他們自己性命交關的大問題，我們不得不盡最後忠告之道，如若作惡不悟，繼續胡鬧，那時全國人民，忍無可忍，把他們拋到茅屎坑裏去，那是悔之莫及了。』

目前，要繼續抗戰，消滅內戰，只有執行中共所建議的十二條辦法；進而必須把一切政治設施放在堅持抗戰，團結，進步的基礎上面，放在『自力更生』民族獨立自由解放的前途上面，這就是說：迅速召集真正代表民意的國民大會，結束一黨專政，還政於民，實施民主政治，以利團結抗戰的。

可是，蔣介石於一月二十七日演講，於指出新四軍的所謂『罪狀』（見前）后，就說『這純然是爲

了整飭軍紀，除此以外，并無其它絲毫政治或任何黨派的性質夾雜其中」（這是假話，我們前面已指出來了）跟着更不自覺地如見心肺：「可是我這種苦心，并不能感動他們，而反以爲中央是柔弱無能，甚至以爲我對他們忌憚，竟以影響國際視聽與分裂內戰爲宣傳，更不惜使日人知道我們內部的弱點，用這種手段來相威脅，試問一個部下的行動，放肆跋扈，荒謬絕倫，其用心之惡劣，乃至不惜以對敵方揭本軍弱點爲工具，來恫嚇上官，如此倒行逆施，還可容忍嗎？」（拿事實來對照，就知道國民黨的「苦心」在什麼地方了。）國民黨這樣自己做錯事，還圖抵賴，轉嫁別人，那統一戰線的分裂將是必然了。

在這個時兒，日本不耐煩於「渝國府的緩慢地自行停止抗戰」，就採取着突擊性的打擊方法，如一月的進攻豫南，三月的擾亂粵海岸和最近的搖蕩贛北，蘇南……除打擊我主力，掠奪財貨外，重要的是在動搖美英派，使他們在日本武力威脅下悲觀失望，和在外合親日派，使他們的整個計劃得以早日完成。

特別是豫南一役，使國民黨慌了，因爲損失精銳好幾萬，外加美「主子」不願此時爆發內戰，蔣就二月三日召見葉劍英，「願意」談判，提出三項：（一）承認八路军維持現狀；（二）即發給八路军被扣軍費；和（三）准許蘇北新四軍編入八路军，而八路军則增加一軍。五日葉就飛延安了。但是不久日軍似不爲已甚，他們又（於二十二日）命令八路军軍集中河北，同時決定國參會開會日期，以便表示「民意」，「幫兇，幫兇」。

但於那三項辦法，根本牛頭不對馬嘴，何況國民黨連這小小的「願意」也不够呢！所以中共七參政員二月十五日以代電致國參會祕書處：「關於政府對新四軍之處置，我覺中央會有嚴重抗議，并提出善

后辦法十二條（見前）……請政府採納，在政府未予裁奪前，澤東等礙難出席，特此達知。」三月二日另函：「關於我黨七參政員礙難出席本屆參政會，事前曾有二月卅日電通知到案，茲為顧全團結加強作戰起見，必武穎超就在渝所見各方奔走之殷，提出「臨時解決辦法」十二條附列於后：（一）立即停止全國向我軍事進攻；（二）立即停止全國的政治壓迫，承認中共及各黨派之合法地位，釋放西安、重慶、貴陽及各地之被捕人員，啓封各地被封書店，解除扣留各地作戰書報之禁令；（三）立即停止對新華日報之一切壓迫；（四）承認陝甘寧邊區之合法地位；（五）承認敵后之抗日民主政權；（六）華北、華中及西北防地，均仍維持現狀；（七）於第十八集團軍之外，再成立一個集團軍，兩集團軍共轄有六個軍；（八）釋放葉挺回任軍職；（九）釋放所有皖南被捕幹部，撥款撫卹死難家屬；（十）退還皖南所有被獲人槍；（十一）成立各黨派聯合委員會，每黨每派出席一人，國民黨代表為主席，中共代表副之；（十二）中共代表加入參政會主席團，倘此十二條能蒙政府採納，并得明白保證，必武穎超屆時必可出席，此點已得延安我黨中共覆電同意，特此達知。」由此足見中共為國家，為民族，願再作讓步（雖然這讓步是非必要的），緩和條件，來促政府迅即採納實行。

但政府對這代表全國人民公意的二次辦法又是怎樣呢？

在三月六日，蔣代表政府，向參政會說明對中共的態度：「而政府方面……以及本席自己也沒有接到他這樣的條件」——綜觀兩次條件的內容：「第一就軍事部份，」它（指兩次辦法，下同）要求「不得裁判叛軍，要挾政府賠償叛軍損失，」——有第二個私黨私人的軍隊系統，「這」有兩個軍令，「何以

「自別於偽組織的偽重委會」；「第一次就政治部份」；它要求「一國兩個政府，不受中央管理」；「在國民政府之外，另成立……所謂敵后民主政權」；「如此割裂國家的政權那又何以異於敵人扶植下的偽組織各種叛逆的政權？」；「第三就黨派部份」；它要求「提高共黨地位」；這不「斷裂我們尚在萌芽的民主政治之根基」嗎？所以「是我們國民政府之所不容」的？跟着，它申斥自一九三八年以來，中共「違背」諸言，「政府既要對外作戰，又要加上安定內部的任務」；太「悲痛」了。「政府對於這次事件，只要能達到團結一致作戰到底的目的，一切問題皆願聽從」；「唯違背軍令軍紀，及抗建綱領者除外」；跟着更指出，「以後亦決定無剿共的軍事，這是本人可負責聲明，而向貴會保證的」；（但把它和中共二次辦法對照，和抗戰十四個月的事實對照，國民黨的虛偽，無改過自責決心，更缺乏合作誠意，是擺在眼前了。）

可是我們的豬仔參政員呢，跟着就「激烈」討論，助紂為虐，奉命唯唯，通過促中共遵守諾言，「除有軍紀軍令者外，在遵守抗建綱領之原則下，無不可交付本會討論」的決議案了。

但是正因為這一屆參政會是帶着一黨包辦性的，反共性的，所以重要如民主憲政問題誰（因有正義感的參政員都不能出席）也不提出來了。這樣，「號稱民意機關，然其決議早等廢紙，為民主政治之前途着想，實不堪痛心」（翰奮五日辭參政員電）；另外，他們却可達到幫兇「民意」的目的了。

跟着他們不作消解內戰，却作剿共準備。在外交上，他們說：如美國立即以援助給與中國，則中國之軍隊可開始反攻；任何和平建議，其用意乃在使日本脫離泥淖，以便從事他處侵略者，中國決不之聽；予當然贊成和平，吾人係被迫而抵抗，如日本以為可以合作侵略其他民族誘致吾人，則日本可謂不明瞭中國人

者矣！在輿論上：動員御用各臨時省參政會（如豫、湘、粵）各團各報指摘中共「背信」或要求討伐；又更公然呼中共爲「奸黨」，新四軍爲「叛徒」，八路軍爲「匪軍」（那麼，不再剿共保證是可「負責」了）；在軍事上：一面「已無新四軍部隊之存在，惟中央軍與當時之匪軍間或有衝突發生」（十三日渝軍委會發言人談話），一面限八路軍三月底集中河北；一面在最高國防會議內定西北剿共總司令何應欽、華中李宗仁、江南顧祝同，并移動百萬大軍開駐各地等候總攻。

這說明頑固反共派是有決心進行內戰，是有決心分裂國共合作了。於是一大串待后演出誠如中共軍委發言人指出，日寇及親日派的聯合剿共，和平妥協的整個計劃即：「（一）用何白名義，發佈致朱彭葉項之脗齊兩電，以動員輿論；（二）在報紙上宣傳軍紀之重要性，以作發動內戰之準備；（三）消滅皖南新四軍；（四）宣佈新四軍叛變，取消該軍番號；以上諸項均已實現。（五）任命湯恩伯、李品仙、王敬久、韓德勤爲華中各路剿共軍司令，以李宗仁爲最高總司令，向新四軍彭雪楓、張雲逸、李先念部實行進攻，得手後，再向山東與蘇北之八路軍進攻，而日軍則以密切之配合，這一步驟亦已開始實行。（六）尋找藉口，宣佈八路軍叛變，取消八路軍番號，通緝朱彭；這一步驟亦目前正在準備中。（七）取消重慶西安桂林等地八路軍辦事處，逮捕周恩來、葉劍英、董必武、鄧穎超諸人；這一步驟也在開始實施，桂林辦事處已被取消。（八）封閉新華日報；（九）進攻陝甘寧邊區，奪取延安；（十）在重慶及各省逮捕抗日人士，鎮壓抗日運動；（十一）破壞各省共產黨組織，大批逮捕共產黨員；（十二）日軍從華中華南撤退，中國宣佈收復失地，同時宣佈榮譽和平之必要性；（十三）日軍將華中華南之兵力向華北增加，殘酷的進攻八路軍。

實行中日夾擊，全部消滅八路軍和新四軍（十四）除一刻也不放鬆對八路軍新四軍進攻外，在各戰場中日兩軍繼續去年的休戰狀態，以便完全轉到停戰議和局面（十五）中日兩國訂立和平條約，中國加入三國同盟，以上各點正在積極準備中。雖然現在英美派因美英積極援華有把中國國命附麗於英美「世界」的利益的危機，但由於希特勒莫索里尼與松岡會晤的今天，行見歐非亞三洲烽火接連起來，那時後，英美派將因日軍的截擊縮旬使他們永別了英美「主子」的懷抱，除部份與人民大眾聯合外，其他必和親日派合流，殊途同歸，更進而中日和平了。

中國人民還有自己的，達到民族解放的道路，我們不但有責任而且自問有能力挺身出來收拾時局，決不讓日寇與親日派橫行到底。時局不論如何黑暗，不論將來尚須經歷何種艱難道路，尚須付何等代價（皖南新四軍是代價之一部份），日寇與親日派總是要失敗的，中華民族一定要解放的。因為，

第一，全國人民是堅持抗戰團結進步，反對投降分裂倒退的。在這抗戰三年多以來，他們千百萬的他們在許多敵後抗日民主政權下新生掌握行使「我們的政權」，所以他們能透視事實，一定支持革命力量，打擊反動力量，完成抗戰勝利，進而實現新民主主義的。

第二，發動與支持統一戰線的中共，它現在已經不是一九二七年那樣容易受人摧殘，而是擁有全國精英八九十萬團結一體的黨員，擁有在十年內戰三年抗戰中鍛鍊的百萬人人民軍隊（八路軍五十萬，新四軍十萬，抗日聯軍三四十萬，另外各地直接間接領導或影響的無數萬千游擊隊，自衛團……）和有為大眾接受，了解且支持的正確路線這樣言行合一的偉大政黨了。所以有了這一支不可戰勝的隊伍，新中

國就有前途，大眾就有保障，它將是新統一戰線的支柱；

第三，中國其它黨派，包括國民黨在內，其黨員的多數，爲了他們自己黨派的前途，見於民族危亡的鉅禍，必然很多不願意投降與內戰的，即使國民黨員有些一時被蒙蔽，但時機一到，他們還會覺悟過來的；

第四，中國的軍隊也是一樣，他們的反共，大多數是被迫的；

第五，一切不管親日派或美英派，它們的「主子」，因爲它們「世界」現時已到發生大變化的前夜，總是靠不住的；何況英美自己性命交關，決不至支持那不合時宜，有利於日本的國共分裂而自促滅亡的；

第六，世界革命勢力逐漸高漲，各地無產階級革命和殖民地革命即將爆發，它與中國革命必然互相配合爭取勝利；

第七，蘇聯是世界上第一等偉大力量，它是決然幫助中國抗戰到底的。

所以，我們人民大眾目前應牢記着皖南事變血的教訓，加強決心，加強毅力，加強努力，但不是急躁，而是沉着，堅決勇敢，先進行我們目前所應進攻的工作和鬥爭。不獨積極幫助鞏固與發展中共，抗日部隊，和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力量，而且還要用我們的意志與力量，在政治上，組織上，軍事上準備好一切，進而加緊宣傳，揭破頑固反共派（親日派，英美派）的藉口上陰謀，以便就是現在暫時不能全部肅清他們，而在統一戰線的發展下，使工，農，小資產階級（包括中產階層）與抗戰聯共的資產階級空前的團結，順利地完成抗戰勝利，建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這就是中國人民的方向，他們將按着這方向倍加努力的！

一四 一個光明的前途——建立新中國

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具體的說，就是以國共合作爲基礎的民族統一戰線（過去，反帝的；現在，反日的）。

可是在國共兩黨（特別是國民黨）的陣營裏，却還有少數幼稚份子（黨外的人也包括在內）但不清楚了解，甚至對這次合作表示懷疑。因此就常常發生了許多不應有的大小磨擦或裂痕（當然磨擦的主要來源是由於敵僞的挑撥與頑固，反共，妥協份子的從中作祟；少數幼稚份子一時不察，就上了他們的當，同樣助長這一暗流的擴展）這，無異議地就加強了漢奸，妥協派頑固派及托匪對抗戰的分化挑撥與離間作用。

在對抗戰過程中的前提下，漢奸，妥協派，頑固派從右方面播送着：「國共合作，不過是共產黨一時的手腕。」是「爲的蘇聯的利益。」跟着他們更放高嗓子：「抗戰在目前只對於共產黨有利，共產黨的勞力不是在抗戰中擴充起來嗎？」因此，必然地得這樣的結論：「中國目前自然應該先反共，然後抗日。」托匪却從「左」方面拚命宣傳：「中國民族革命，就是打退日本，歐美亦是要打我們呀！」所以「不應當單獨抗日，而必須同時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又「中央一貫的剿匪政策是不能變的，目前不過是緩和而已，國民黨蔣介石只是投降日本，不會真正打日本。」所以「國共合作是不可能和絕不容許的事情」……由

此，必然地歸結到這樣的結論：「民族革命戰爭必須與國內戰爭同時進行。」

在對抗戰勝利後的問題上，漢奸妥協派頑固派從右方面來佈散毒素：「抗戰失敗了是日本的天下，抗戰勝利了是共產黨組織蘇維埃的天下。」托匪卻從「左」方面來造謠：「共產黨出賣階級，向國民黨投降，所以抗戰勝利後，共產黨除白白替國民黨打下天下外，還要遭受比一九二五——二七年更殘酷的大屠殺！」

其實，不管漢奸妥協派，頑固派，托匪的兩面手段怎樣「高妙」，盡挑撥，分化與離開的能事——「對國罵共，對共罵國，對日國共都罵；見馮言戰，見汪言和，見蔣和戰都言」——這是一九三八年在漢口很流行的一副對聯，現在借用在這兒不過僅僅表示奸徒們的兩面手段如何而已。現在「見汪言和」的一部份大資產階級們已準備在與汪派殊途同歸地來結束抗戰了，所以「和平」在那些英雄們口中是所見略同，不很清楚了嗎？——但結果還撲了個空。

我們知道，統一戰線不是什麼人「弄手腕」——這曼努意斯基於一九三五年八月在莫斯科第三國際七次大會上聲明：「中國共產黨提出中國人民反日統一戰線綱領，並不是什麼玩弄手腕，對保護中國人民去反對帝國主義強盜的工業，玩弄手腕便是罪惡，對敵人可以玩弄手腕，但對於人民，却不能玩弄手腕。人民的生命和民族的命運，共產黨不顧一切犧牲去保護的。」——而是基於大家一致的要求：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建立民主共和國。因此，誰也不能，也不應希望自己盟友的力量在合作過程中削弱下去；假如這樣，根本就助長敵人的氣焰。所以應和衷共濟地本着平等的合作，來互相幫助，互相發展，共同負責。

共同領導；共同討論，共同協商；互相諒解，互相讓步。至於抗戰是爲中華民族求解放，自由與幸福，決不是爲了那一部份人的利益，這一面抗戰，一面進行國內戰爭，是絕對的錯誤了。至於同時打倒一切帝國主義更是不應該，這適足於分化國際對我們的同情與援助。

還有，抗戰勝利后，是「國民黨的天下」呢？還是「共產黨的天下」呢？這只是杞人憂天之談，因爲能打退日寇，則兩黨在全國同胞面前的威信只有加強，那誰願意違反民意來打倒誰，做民族的罪人呢？就是有這一回事，那它也必然地爲國人所共棄，所以，那時候，很明顯地，國共兩黨將患難相共，艱苦共享，而更加親密攜手地進行建國的大業。

不獨蔣委員長有這樣決心與表示，就是共產黨也屢次聲明：「共產黨不僅誠意在抗戰階段中與國民黨肩攜手共同救國，而且決心在抗戰勝利后與國民黨和衷共濟地共同建國。」

國共兩黨既在合作抗戰，又將合作建國，那麼將建立一個怎樣的國家呢？

有些人們以爲中國可走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國家的道路。但從現在的國際環境來看，基本地，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鬥爭的，資本主義向下沒落，社會主義向上生長的環境。正因帝國主義快要死亡，它就非更加依賴與剝削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過活，所以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要建立什麼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國家，它不但不容許，且有有力的反對了。日本現在在變中國爲殖民地，不就是嗎？與自詭獨立自主，其實在日寇軍部腎囊緊包中的汪政權，不就是所謂「一黨專政」、「一個主義」的縮影嗎？其次，社會主義的蘇聯也不容許的，因爲在這個世界上，所有帝國主義都是我們的敵人（一般地來說是

這樣，但因我國與日寇搏鬥緊張的今天，特殊地我們要本自力更生的立場利用它們間的矛盾，就是部分的幫助也要爭取的。因為中國的獨立，會鼓勵而且幫助它們的（特別是亞洲的）殖民地的解放鬥爭，更進而動搖資本主義世界的體系，所以中國要獨立，決不能離開社會主義的蘇聯，國際無產階級（與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大眾）的援助的，這就是說，特別是蘇聯的援助，是民族解放勝利決不可少的條件。一九二七年民族資產階級的叛變，投靠帝國主義，拒絕蘇聯的援助，革命就是失敗，且招致日寇深入國境，幾乎國亡家破，不是一個很好的明證嗎？現在德、意、英、美，又要出賣中國了，它們「有條件」任憑日寇的封鎖緬越……這表示它們怎樣的希望與祝頌中國「勝利」了。但蘇聯在話少而實惠下予中國無限的幫助，最近且加強西北（中國唯一的）國際公路的運輸，以對消帝國主義者們的「好意」這不表明了嗎？

再從最近國內環境來看，工、農、小資產階級在中共的領導下已形成了一個偉大的獨立的政治力量，所以要抗戰建國，離開了他們，就一步也不能走動；同時，現在已不是一九二七年，「誰還敢於用腳先踢他們，他們的脚也就變爲粉碎！」這樣，資產階級專政不但此路不通，而且爲人民大眾所不容許的。

可是還有些人們以爲中國也許突變地可能來個基瑪爾革命的再版，但我們知道：

第一，從中土兩國間的差別來看，土耳其是複雜民族，人少，地小，市場不大（這帝國主義不大注意），帝國主義易統治，可妥協；中國却是單純民族，人多，地大，世界上投殖資本和出賣商品的一個主要的市場（這帝國主義大大注意），帝國主義難統治，不妥協……

第二，從與土地革命的聯系來看，當時土耳其沒有或幾乎沒有工業無產階級，而且也是沒有偉大的農民土地革命的國家；它所進行的是上層的民族資產階級革命，在反帝鬥爭中發展起來的，它發展下去的傾向實際上是用來反對工農，反對土地革命的發展，所以在打敗英希聯軍后，就不准再前進，反而停止在建立他們的「祖國」了。

中國呢，因為現在已有相當強大積極的戰鬥的工業無產階級，他們在農民中間享有偉大的威信；同時，中國已有發展着的土地革命，在其發展過程中將肅清封建殘餘。所以在這次抗日戰爭中由於帶着深刻的民族性和鮮明的革命性，使革命更徹底，不獨已在摧毀日本帝國主義中，且將要解決土地問題。

這樣說來，基瑪爾革命在中國不但不可能，而且也沒有根據。

另外，就有些人們出來說可走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路。當然，根據中國革命的發展，將要走到這一條人類共同到達的終點；不過現在我們是在新民主主義階段，由於這一階段的完成，才再前往跟着完成社會主義階段。

但有些幼稚分子，迷惑於所謂「一次革命」，「舉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其實這是空想，不了解中國革命的發展，兩步作一步走，降低對於當前任務的努力，是有害，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的。

「一次革命論」真正用意是，與幼稚分子的空想相反，在取消抗戰，在「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下，反對共產黨，作投降日寇的準備。這，他們變成了某些大資產階級的急先鋒，大罵共產黨；因為「罵」倒

抗日最堅決的共產黨，他們就可以享受那百分之四十九或五十一的「合辦實業」投資了。原來「一次革命」就是不要革命，「絕對不去妨礙日本先侵略中國」的具體化。

「一個主義」不通，因為在階級存在的條件之下，有多少階級就有多少主義，甚至一個階級的各集團中還各有各的主義；「一個政黨」也不通，因為「中國共產黨乃中國正在發展的中國工業無產階級自然的階級鬥爭所湧現的政治組織之一部。即使吾人能以人力解散現存之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必不能隨之消滅，彼等必將另行組織」（國民黨一大會關於聯共的決議）。「一次革命論」到此完全破產了！

資產階級掃地既根本走不通，無產階級掃地現在也不能走；那麼，我們現在是在走新民主主義的路，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建立是它的目標了。（見第一章轉變期的中國）

這個新民主主義共和國就是一個「求國際地位平等，求政治地位平等，求經濟地位平等」（孫中山）的國家。

它是一個獨立國，不受任何外國的干涉，同時也不去干涉任何外國，以平等精神同一切尊重中國獨立的國家和平往來，共存互惠，對國內各民族，全都給予平等權利，而在自願原則下互相團結，建立統一的政府。

在政治關係上，它的國體將是工、農、小資產階級聯合掃地，由他們聯合執掌政治，管理國家，鎮壓與消滅反革命分子，來保護自己的政權機關。它的政體將是採用民主集中制，國內人民的政治地位一律平等，

各級官吏都是民選的；採取國民大會，省民大會，縣民大會，區民大會，直至鄉民大會的系統，并由各級大會選舉政府；凡十八歲以上的公民，除犯罪者外，不分階級，男女，民族，信仰，財產與教育程度，都有選舉被選舉權；人民享有工作和受教育的權利與有身體，結社，居住，言論，出版，集會，信仰，財產，遷徙等自由，并在政治上物質上保證它——只有這樣才能適合於革命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適合於表現民意與指揮革命鬥爭，適合於新民主主義的精神。

在經濟關係上，這個共和國將徹底實現，節制資本，使大工業，大銀行，大商業歸國家所有，但同時不去沒收其它「不能操縱國家生計」的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工人們的生活條件和法權地位將大大的提高，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勞動保險及一切福利勞工的辦法；跟着，它將採取某種必要的方法，沒收大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及少地的農民，實行耕者有其田，掃除農村中的封建關係，使這土地變為農民的私產，滿足他們的土地要求，并廢除苛捐雜稅重租重制；其它，學生有書讀，并保證貧苦者入學；各界都有事做，能夠充分發揮他們的天才。一句話，使人人有衣穿，有飯吃，有書讀，有事做。

我們抗戰建國的最崇高標誌就是建立一個這樣新政治，新經濟的民主共和國。

我們將怎樣達到這個標誌呢？我以為：

(甲) 基本的，主要的，是我國的進步——

- 一，鞏固和擴大各黨，特別是國共兩黨的組織基礎。
- 二，加強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三、對抗戰建國綱領與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的澈底執行；

(乙) 是日本的困難；

(丙) 是國際的援助；

這三大條件的完成是抗戰勝利的真正保證。

但在目前，爲了爭取時局好轉，克服逆轉危險，更具體的，更迫切的，我們認爲在中國的進步這一條件下，必須強調抗戰，團結，進步，三者不可缺一，并在這一個基礎上堅決執行下面的任務：

一、要普遍擴大反汪，反漢奸的宣傳，并揭穿一切投降分裂的陰謀；

二、要猛力發展全國黨，政，軍，民，學各方面的統一戰線；

三、要廣泛開展憲政運動，力爭民主政治；

四、要抵抗一切投降，反共勢力的進攻；

五、要大大發展抗日的民族運動；

六、要認真實行減租，減息，減稅與改善工人生活；

七、要鞏固與擴大各個抗日根據地；

八、要鞏固與擴大進步的軍隊；

九、要廣泛的發展抗日的文化運動；

十、要鞏固共產黨的組織，無黨的組織或黨弱的地方，要發展黨的組織，沒有一個強大的共產黨，就不

能解決抗日救國（因為這些任務是共產黨提出的，不得不這樣；其實是鞏固各黨派的組織與各黨派的強大）的任何重要問題（中共二一決議）。

這是對症下藥，起死回生，趕跑日本帝國主義的十大任務。我們堅決相信，它雖然是由共產黨提出的，但這是全國人民的事，要全國人民做！

全國同胞們，我們要堅決支持基於國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現在，新中國航船的桅頂已經冒出地平線了，只要我們更加堅持，更加團結，更加進步，它就到岸了。

這就是我們給日寇漢奸，妥協派與反共派，頑固派，托匪的最莊嚴的最有力量的回答。讓它們在我們面前發抖起來，滾到東洋大海裏去，中華民族是一定要勝利的！

舉起你的雙手吧，來歡迎我們的光明的新中國！

一九四〇，七，六——四，一，三，二七。

後記

「九一八」那年在北國剛念中學，但由於瀋陽事變的突發，更加上師友的幫助與指導，我才開始對中國政治感覺到了很大的興趣。

一九三三年跟家裏到南方來，但剛到達南方，長城血戰展開了，大規模的所謂最後「圍剿」開始了，「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公佈了……所有這些，却使我幼稚地不顧一切地在同學間展開聯共抗日的宣傳與辯論，我的見解居然也取得了部份師友的贊同。

不過，事實上在一年後我才開始對國共合作作有系統的研究，差不多大部分的時間都化在這上面。是的，那時後對研究是很適宜的；但不久「八一宣言」的具體反應——「一二九」運動爆發了，我也像其他的青年一樣，投向這抗日救國的洪流……

抗戰的第二年，雖然我收集了一些材料與好友們的督促，但還不敢貿然動筆，只論文式地寫了一些，直到今年春天讀到毛澤東先生的論新民主主義後，覺到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運動就是我幾年來所研究的中國革命之重要的一部份，國共合作問題，所以大膽地決定作這一試嘗。

剛在這個時兒，北社準備與答應刊行這一類的冊子，我就從一九四〇年七月六日開始寫作，直到二十四日才全部完成，成六萬字的冊子。在一九四一年三月中又添寫了一點（第十三章）原題為「國共

合作過去現在和未來，」但爲刊行的便利計，就改爲「論國共合作」的書名。

這本幼稚的試嘗作，是我幾年來研究的小小收穫，也許對讀者在研究中國革命的課題上有一些裨助；但正因爲它是試嘗作，想謬誤是不可避免的，這望讀者多多指正，來豐富與幫助中國統一戰線運動的擴展。我在等候着各方面善意的批判。

最後，特別值得提起的，是這書在材料的蒐集與分配上，燕兄，彤姊，震兄，澈兄，和岳兄，曾給予很多的幫助與鼓勵，我不知道該怎樣的感謝他們呢！現在在川西的燕，在皖北（？）的彤，在黔中的震與在蘇北的澈，也許能看到這小冊子，是無疑的。但，可惜的是，岳却不幸於去夏在青浦軍次給敵暗算，飲彈犧牲了，這我，我有什麼話要說呢，謹將這書紀念爲民族爲革命而犧牲的他！

馬 健

6

713225

713

\$1.00